歷史動力論

陳易編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初版

歷史動力論（全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陳易
校閱者　江恆源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發行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暨各省　大東書局

編者導言

近代科學的宇宙觀之發展，使人類對於一切有了正確的觀念。第一箇科學上的革命家就是哥白尼（N. Copernicus），他使天體中地球的位置有了正確的觀念，開始了科學的宇宙公律的觀察；第二箇科學上的革命家就是達爾文，他發見物種變化生存競爭的原理，開始了科學的生物世界公律的觀察。歷史中的重要事變或時勢，也是很嚴格的循著科學的規則，也是可以用科學的觀點來解釋的。

可是、一般人對於歷史，多只努力於表面上的研究，誤會叢生。譬如，我們所常說的『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我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每每以爲『英雄』是『時勢』的動力，卻不知『時勢』才有力量造出『英雄』。任何偉大的個人終難逾越物質環境的範疇。

對於歷史的研究，我們要遵循一位最光榮的學者斯密斯教授（Prof. G. E. Smith）在最近的一篇關於『原始人類』（Primitive Man）的講演中所說的，他說：

『無疑的，原始人類還是繼續像他們的猿類祖先所慣常做的一樣去消磨他的時光，主要地是尋找食物與防止危險；可是他們在那種關係他們的重要的幸福的觀察和判斷中得到了大為增加的能力，得到了可驚的本領。那種假定他們消磨他們的時光於懷想他們的周圍的世界的，於觀察在他們的頭上的星晨的性質的，於創立靈魂的學說的近代謬誤之遠離於事實，恐怕要像以為普通的近代英國人都在用心研究動物學，天文學，和哲學一樣』。

這是純粹不作虛偽的科學的歷史觀，下面一段，把他的科學的歷史觀表現得更為明顯。他接著又說：

『這種觀察是不曾想到人類思想的特點的。人類不集中他們的注
意力於那些特別的問題，除非有些確定而明顯的環境迫著他們那樣
做。日月在原始的人類本是不當為科學的好奇心的目的物的，一直
等到一些很特別的理解力，大概是被初期的農業試驗中的某些環境
所激動的，逼迫了他們對於那些似乎影響著他們的生活方法的事情
用一些思想』。

這是對於歷史研究的唯一的科學的探討。

本書就是根據這種科學的觀點而編成的，因為祗有科學的智識，方
能夠引人走向眞理的道路。『等到這箇方法用在精神科學上的時候，便
能對於支配歷史的勢力有一種新的見解了』。(Müller-Lyer: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第四卷)

本書主要地是在糾正一般人對於歷史的誤解，使讀者能從這本書上

所述的一切解釋之中，得到對於歷史的動力之正確的認識。其中關於美國內戰問題是舉例；藝術問題是討論的性質，在本書中只能作爲附錄。

最後，還要聲明的，本書不是創作，不過是根據歐美學者的著述來編成的。所根據的書主要的是克拉克的『歷史叢論』(Clarke: Essays on History)，其他如伏爾佛遜(S. y. Wolfsen)，拉波播爾(Charles Rappop ort)，范格里夫(Fairgrieve)，勞爾士(Knowles)，孫普爾(Semple)諸歐美學者的著作也引用不少。

編者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日

歷史動力論目次

歷史動力論

第一章 英雄問題

我們常常聽見說，人類是他們的命運的主宰，是能夠超出經濟狀況之上的。然而人們所謂『經濟狀況』正確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他們認爲是保障私利，我們是同意的。如果牠的意義是在於人的活動而不是大部分被他的時代和地位的經濟條件所限制，我們便不同意了。凱撒(Julius Caesar)未曾帶著榴彈礮渡瀘比康河(Rubicon)，克魯紗達爾(Crusaders)未曾坐著汽車經過歐洲，哥倫布未曾用過輪船式的船舶而發現美洲，乃至加里太子(Prince Charlie)未曾用過火車輸送他的蘇格蘭高地人往返於大爾比(Derby)之間。如果歐洲人發現：英國陸地測量簿的第一版沒有

用印刷機來印刷，英國十五世紀的詩人喬賽（Chaucer）沒有用自來水筆做詩，巴絲女王從沒有看過電影，那對於世人是有趣的事，而對於另一部分的人卻又簡直是新聞了。

對於任何有理解力的人是沒有『絕對不變的歷史學說』的。歷史不是一種精密的科學，牠只是部分的社會科學。人的原素，或『人的精神』，是一種極不能確定的數量，除了笨伯而外，沒有人會預備提出關於人類行爲的『絕對不變的』學說。然而，人性的明顯的成分是變化極少的或死板板的，同時雖然沒有人能夠預知將來（『預言』是最無理由的謊謬語），然而人類不變的精神給我們以研究過去的和現在的歷史的原理的決定的方法。現在的人類是一箇寬大與貪婪的，機敏與狡詐的，博愛與殘忍的，勇敢與懦弱的，智敏與愚鈍的混合物。一千、二千、乃至五千年以前，有史以來人類都是絲毫不爽的同樣的。大衛德王（King

David）與赫里莘格（Hari Singh）或摩理思（Hayley Morris）之間，亞希班里波（Assurbanipal）與已故的利歐普爾王（King Leopold）之間，達理克（Sir Francis Drake）與飛希大將（Fisher）之間，太勒（Wat Tylre）與格拉奇（Willie Gallacher）之間，墨格萊（Ferdinand Magellan）與亞曼德蓀（Roald Amundsen），或培根（Roger Bacon）與越姆西（Sir William Ramsay）之間，根本上都沒有精神上的不同。如果說一切的人有共同心理與精神的屬性，那是一箇庸俗的觀察，而是有巨大的區別的，箇體的特性問題大都具有這些屬性的程度問題。

『最潔淨的米穀在篩過之前也會有一些沙泥的。』

同樣，如加賚爾（Carlyle）曾經說過的，世上最爲人所不齒的鄙夫在他的身上也隱著一些神聖般的光輝。

歷史是人所造成的。動物沒有造成歷史。人類創造歷史所用的形式

，總是依照那些財富的生產方法過去與現在的，和以那些方法爲基礎的社會關係而決定的。這是與說一箇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只是因爲他被物質的利益所驅使著，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許多人還是像這樣的說。他們對這箇問題的智識或是空虛的，或是已經得著他們由對於這箇法則糊亂的批評中所有的知識。物質的利益未曾引起那已故的凱爾哈地的一箇單獨的吶喊，也沒引起在他整箇生涯中他所做的一箇單獨的公開的行爲與舉動。凱爾哈地是以他在國會中的鬬爭，他在鑛工的組織中的工作，以及創立獨立工黨造成了歷史。『在實質上他不曾爲自己著想過，反是他在努力於做有價值的犧牲，他的勇氣是堅强的，他的誠心也是同等的堅强的，他是誠懇而頭顱清晰的人』：一箇人對凱爾哈地是可以隨意的造出冗長的頌詞，尤其是可以拿着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他對歐文的崇拜，推測那感動他的不可捉摸的東西。不管怎樣說，那件牢不可破的事總

是具在的，凱爾哈地的一生之所以聞名的而他的名字之所以成爲歷史的，是只因爲他這箇人能在英國資本家之下表現爲被壓迫者爲新社會制度的擁護者。凱爾哈地是因爲他的當時與當地的經濟促成他造成歷史的。

『人的精神』是歷史中的一種『動力』麼？對於這箇問題的一般的答案就是如果沒有『人的精神』，就不會有任何歷史。歷史事實的著作者，卽是歷史事實底負責者。他判斷過去和現在。對於同他的利益、需要、正義和眞理的理想，相反的，一律處罰，責其非是。他用箇人道德的名義，或公衆安寧的名義，給過去的世紀以德行的評價，或嚴厲的提訊之於『歷史的衙門』之前。他是榮顯和貶黜底區劃者，各世紀與各英雄的聲譽，由他造成和恢復。對於被輕視的世代，則予以罪大惡極之名，而於人類爲行善有功之人，卽爲之建修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塔，他把一箇亞第拿（Attila），一箇多格碼大（Torguemeda）一箇拿破崙（Napoleon）

一箇佛蘭梭瓦大西士（Francois d'Assises）一箇巴士特（Pasteur）造成代表的名字，可紀念的人，使我們照其施於人類的影響，而作恐怖的太息，或表示無限的欽佩。已往的歷史教科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於祭臺上面，英雄就在祭臺上發出神聖暈光以決定平民的命運，變換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現和發明，優待和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和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裏，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裏，去尋求才能找到。這般歷史家中有一位甚至說：埃及女王克麗阿巴特（Cle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梯姆（Actium）戰爭的原因；還有一位也說：滑鐵盧戰爭時拿破崙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了一箇方向。

在歷史的研究中，那必然引起最大的注意的，與其說是各箇男女的生平傳記，不如說是制度及運動的起原、勃興、與沒落。羅馬帝國的沒

落是比較康斯坦丁帝的生平更大些的事件；文藝復興事件是較之偉大的羅遠左的行爲更大些的事件；宗教改良是比較馬丁路得與約翰加爾芬的幾種活動更有關係些。羅拉多達芬希的傳記之不是意大利繪畫史，猶之凱爾哈地的傳記之不是英國社會主義史一樣。曾經有一箇偉大的—因爲是最忠實的—人物—牛頓，說了一段最有價值的話：

『我不知道世界上的人當我是什麼樣的人，但是在我自己似乎是好像一箇小孩子在海邊頑耍，時常尋著一箇比平常光滑些的石子或美麗些的貝殼，而那在我面前的眞理的大海卻全部還沒發現。』

英雄的崇拜，只是在我們追憶那箇英雄所產生的原理或眞理的時候，是對的。這種崇拜必定要承認的，因爲這是人性的太有力的而不能全部消滅的一箇要素。然而，偉大的人物不過是歷史發展大海岸邊牛頓式的石子和貝殼，但是牠們並不是大海的本身。

或許曾經發表過的最危險的謬見就是加賚爾關於歷史的著作偉人論(Great Man Theory)。加賚爾所認識的歷史不是一箇社會的與經濟的發展問題，而是一箇箇人傳記問題：

『我認爲世界史，那人類在這箇世界中所完成的歷史，根本上就是那在這裏努力過的偉人的歷史。』

文明的——實際是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虧得那些曾經『在這裏努力過的凱撒、馬丁路得、富里德里克等偉人。這不是對於加賚爾的揑造。』例如，依照狂妄的加賚爾的說法路得在(Diet of Worms)所造成的是：

『就我們所知道的，牠是近代人類歷史中的最重要的時期。英國清教派，英國及其國會，美洲各國，和最近兩世紀的巨大工作，法國革命，歐洲及其目前各地的工作；這一切的起原在乎這一點：如果路得那時做別種的事情，這一切都不得發生了。』

這是何等可憐的胡說！對於路得爲什麼或是怎樣能夠做這種事情不曾說過一句實在的話。我們再來引用頗布（Pope）的狂歌：

『自然與自然律隱在夜色之中，

上帝說，「且不管牛頓吧」，一切都是光明。』

加賚爾沒有想到歷史—正確的說來—之說明偉人的產生活動比較一箇偉人的生平的研究之說明歷史還要更可能些。

對於這一點，又用爲對加賚爾的易動的感情作用的一箇糾正，我來向那想了解歷史本質的讀者介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著的社會學的研究中下列的一段文字：

『即使我們容納那樣荒謬的假定，說偉人的產生不依賴其所存在的社會所供給的前提，還會有那種十分具體的事實，在缺乏那些由過去遺傳到他當時的社會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堆積物的時候，他是

無能爲力的；在缺乏那些同時存在的人口，特性，智識，以及社會的配合的時候，他也是無能爲力的。假使有了莎士比亞，而沒有文明生活的種種傳説—沒有那從過去遺傳給他的種種使他的思想豐富—又沒有那世世代代爲使用而發達和充實了的文字，他能夠作出什麼樣的戲曲來呢？假使有了瓦特，而具有一切他的發明能力，卻住在一箇不知用鐵的部落中，或者住在只能得著以手風箱煽出來的火煅煉那些鐵的部落中，或者假使他，在車牀未出現的時候，便生在我們的這箇時代；那蒸汽機又會有什麼機會出現呢？假使有了拉普拉斯，沒有那逐漸發展的數學方法（我們知道是埃及人倡始的）來幫助他；他能夠研究天體力學到如何的程度呢？不但如此，如果我們只限於討論那些偉人階級—統治者與將軍們，他們的行爲是那些英雄崇拜者所特別著重的—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問題而得著同樣的答

案。如果塞諾風（Xenophon）的一萬兵是無力的，或是懦弱無能的，或是不服從的，他就不會完成他的勳功偉業。如果沒有訓練的軍隊，那些降生在他們之前的羅馬人遺傳給他們的權威、戰術、及組織，凱撒便永不會獲得他的勝利。再拿最近的例證來說，如果沒有一箇四千萬人的國家供軍隊的需要，同時那些軍隊不是健强的身體的，堅忍的意志的，有服從天性的，和能理解的接受頒佈的命令的人，則毛奇（Moltke）的戰略天才不會在巨大的戰役中得著勝利。」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需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當記得，必需當時具有幾代人積累下來的一定的資料。要這樣天才者才能夠發明。每一種偉大發明，其實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印刷術的發明便是一箇有趣的例證。印刷術的發明者是古籐伯爾（Gutenbery），他的發明根本只在

於鑄造金屬活字并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一看古騰伯爾發明以前的一箇時代，就可以明白這箇發明是一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爲幾箇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這種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伯爾偉大的發明。

『達到星辰』等等的人類精神的偉業都是歷史的事實，但是人成就了這種事物，只是因爲那過去的和同時存在的社會配合的精神和物質的堆積物容許他們去成就。這在那些社會配合變化了（那被經濟的條件所限制又大半是被決定的關係）的時候，新的問題是爲解決社會而產生。在這些問題表現了乃至從前未表現過的時候，這些問題要解決的，如果達爾文沒有發現進化律，瓦拉斯就會發現的；如果亞當斯（Adams）沒有登現海王星，萊夫里爾（Leverrier）就會發現。因爲時間到了這些發現。

的成熟時期——技術所進化所造成的一種成熟。

我們再來引一箇最好的實例，在可怕的伊凡時代的俄國，幷不需要飛行的機械，因此俄皇對於一箇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了自然而裝上了翼，那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的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燬的』。到了二十世紀，齊伯林（Zeppelin）製成『有翼飛機』時。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勢力，如是就宣佈伯齊林爲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一。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羣衆間，幷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把人類分成歷史建築家的箇人與歷史的建築材料的羣衆兩大部分』。『偉人幷非是由天上降落於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

頗克諾符斯克（Pokrovsky）說得好：「如果不由神祕的觀點來看，而由科學的觀點來看，則箇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祇有小小的一部分是由我們自己的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係過去遺留下來的。環境鑄造箇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一樣。好久以前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羣衆要能跟隨在領袖的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一樣具有「英雄的」的精神。依照領袖的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羣衆，這是童話中和歷史教科書中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衝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動他們，否則他們是難以赴死的。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箇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閒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尼古拉第一時代的俄國，一箇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的餘地的。

他在這種環境中，祇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知道他具有偉大的才幹。但假使他是處在一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裏革命的浪漫的風氣盛極一時，那裏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彌拉波、格蘭斯頓、若勒斯等人齊名了。有一位著名作家論及法國大革命時代是最透澈的，他說：『如果舊的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一箇人頭顱裏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箇戲子，排字工人、理髮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擊技師等等，能夠有軍事上的天才。』

所以查理、拉波頗耳特(Charles Rapoport)關於英雄偉人問題所作的五條法則是最合於科學的眞理的。

一、**箇人爲被動的環境中自動的因子。** 箇人，在自然的、社會的和經濟的環境，必然以其被動的性質而顯著時，就成爲歷史過程裏面之一覺悟的和自動的因子。

二、箇人行動的成果離開箇人而獨立。 箇人行動之歷史的成果，表現爲若干箇人集合地動作而生之影響的總和，所以開初對於箇人本身，必然地顯出像處在他以外和他以上之外來的力量一樣。

三、箇人必與歷史相適應才有作用。 箇人，只有在行動與其他有相當數量的箇人和社會力量底行動，顯出同樣意義的場合，才成爲歷史上一箇自動的和極積的動力。換言之，箇人的行動，只有在與聯合起來了的歷史力量之根的傾向相應的條件時，才有歷史的效能。

四、箇人的幸福爲考察歷史之一標準。 必須把決定全部歷史過程是否適應於箇人希望之物質的，智識的和精神的幸福之主觀的理想這箇問題，作爲歷史哲學上正當的問題考察。

五、箇人的作用隨智識之進步而增大。 智識因子之進化的力量，在繼續進步的狀態裏。箇人的歷史作用，隨著意識的進步爲比例的長大。

總之，社會條件利於英雄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英雄一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一箇從眞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每一箇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英雄，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明白英雄爲甚麼像我們所說的祇能改變事變之箇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一般的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爲有了這箇一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沒這箇一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於可能和事實中間的一條界線。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Rapporte;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s a Science of Evolution.

Spencer; Study of Sociology.

Carlyle: Great man Theory.

第二章 地理動力觀

克魯卡賢克博士（Dr. F. G. Crookshank）最近出版了一本有意味的小册子，在其中他說黑種，黃種和白種間的主要區別是因爲這些種族是從各箇不同的猿類進化而來的——黑種是從哥利拉猿類（Gorilla）進化出來的，黃種是從阿遠古坦猿類（Orangoutang）進化出來的，而白種是從溪盤芝猿類（Chimpanzee）進化出來的。不消說，這位有價値而卓異的博士——就科學界而論——乃是很難得的人。然而，顏色的現象——不論同等顯著的種族的特性——顯示了那支配著古代人羣的地理因素所顯出的巨大的影響。這地理動力對人的精神上也有一箇同樣的巨大的影響。因而在人的歷史研究中不能够置之不問。人種學或人類學，都大部分是地理學上的問題。人類的許多模樣、習慣、道德、法律，以及宗教思想也都

是地理學上的問題。依地理學上說來，偶然的誕生常常決定一箇人的道德的與宗教的眼光。如果我們生在波斯或土耳其，我們就必然是模罕默德的信徒或是如奧瑪（Omar）一樣的反謨罕默德者。那末，基督教或佛教對於我們會只有那佛教與囘教現在有了的那種興趣。我們的母親會於出門時遮掩她的口部，同時在我們的餐桌上豬肉永不會發現。歐洲人不是生在東方，但是生在一箇名爲基督教的東方宗教勢力之下，這基督教是羅馬帝國的一箇理想的聖靈，而且那也是不吃死豬的猶太人的阿拉伯半島。

豬就是在想像的情形中也是一箇齷齪的動物。牠是生而食腐物的，而且是被視爲患著慢性病的。是不是這樣不管，在熱帶國家中牠的死屍是比較別的屍體更腐化得快些，總是事實具在的。在熱帶的東方諸國中吃豬肉是會惹起一種特別的病症。可是，在英國的猶太人是可以無慮地

吃豬肉的。無論如何，是不會發生什麼壞的結果。照例的猶太人卻無論在那裏都不會吃豬肉，這是阿拉伯的或東方的豬肉禁律。上帝禁止吃豬肉。他們並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在這箇形式中『上帝』一語只是對於物質環境的便利的名稱。吃豬肉就是找死，部落人員的死亡會使部落衰弱的。衰弱了部落就是減低牠抵抗敵對部落的力量。可能的最大的罪惡就是違反部落的利益。『部落的利益』，由迷信的支配者，變成了與『上帝的利益』同樣的話。當上帝告訴猶太人不要吃豬肉的時候，那只是由僧侶階級的口利用上帝的名義所說的生存競爭的部落誡律。那時，制定這箇誡律是必要的。因爲這箇誡律會保存部落，牠所以是正當的。但是，在今日那不吃豬肉的，同時以『上帝禁止吃』爲其不吃豬肉的唯一的理由的人，就是一箇墮落的無智識的人了。

在那時，最大的巫師乃是摩西（Moses）是希伯來的大預言家及法律

家，曾率猶太人出埃及而至（Canoan 的）。摩西曾經被那些不合理的和無定見的自由思想家加以非難，因為他的十誡之一中說『不要殺人』，然而他又使他的門徒無情地殺人。摩西毫無不合理的。『你不要殺人』是以色列的一條誡律，以色列不要互相殘殺，因為互相殘殺會使部落衰弱。可是，每箇以色列人屠殺 Amalekite 人（聖經上居於 Kadesh 地方行劫之 Bedouin 民族）愈多，他們就愈衰弱，而以色列人在生存競爭中就會愈行昌盛。由摩西傳出的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屠殺以色列人，但是需拿出聖餐杯和獎牌以獎賞那些屠殺了 Amalekite 人的人。

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大半是信奉基督教。在文明的發展中國家代替了部落。然而，我們仍然墨守著那部落的誡律。英國人不要殺英國人，否則就有殺頭的危險。讀者們去問問那些牧師們，屠殺中國人是不是上帝所『說』的。

地理的動力實是比較許多人所想像的更重要些。我已經說明了（在前章中所論的這一點）人的行動的意志力的起原。我要說明他的行動怎樣常常被他的地理環境所決定。倫敦大學的范格里夫教授(James Fairgrieve)，在他所著的地理與世界列强中很簡單地闡明了這箇問題：

『人的行動是被他們的環境乃至被他們的身體的形態所決定的，同時歷史的比較大的傾向大半不是受箇人的特性所影響。總之，地理的條件比較箇人的才能是更有力些，甚至比較種族的特性是更有力些，除非這些特性在地理支配之下』。

埃及文明的起原是因爲經濟地理的動力—保持那在穿過廣大的沙漠的利實是尼羅河的賜與的狹長的肥沃之地中的一箇廣大的人口的必然性。那沙漠就是一箇地理的『支配』，同時因爲牠是保持數千年不被侵入，所以在埃及地域中發達了一箇精神上的特殊形式。

沙漠是埃及的自然障屏，牠不但不是一種障礙物，并且是一種有益於發展的東西。在文化開始，人類生活剛固定的時候，天然障屏是保護文化的發展，防禦一般文化更低的遊牧民族侵入的利器。海洋在人類能航行以前，也是一種自然屏障；大山、沼澤、也視爲同樣的東西；但是各種天然屏障總沒有比沙漠更利害的了。埃及因三面都有沙漠的圍護，從外侵入的禍害很少，所以文化開始時雖然很薄弱，但是發達得極快。

尼羅河流域，我們都知道是文化開發很早的地方，這地方實際上形成一箇狹長的島。因著自然的屏障使牠與外界隔絕。埃及北方臨海（在古時是很好的障屏），東西南三面環著沙漠，只有這箇『孤島』是一條肥沃的流域。在這島的居民，因著灌溉的事業，使他們漸漸地合作起來，地球上再沒有第二箇地方有這樣的保障。加之氣候適宜，土壤又肥沃，所以在這箇時代，即當與外界交通隔絕是一箇有利的條件時。沙漠到

是有利的地理因素。

范格里夫說下列的話時，是很對的：『當埃及失去了牠肥沃的土地時，地理的條件仍然在支配著埃及的歷史，用沙漠的保障的影響並不減少，因爲在那四千年中，當埃及獨立生存的時候，牠的居民極端信賴那他們從沒有與之對抗過的保障』。

但是與外界不相交通，或交通困難，祇有利於古代文明。到一箇特別環境之下所發生的問題解決後，再要往前發展，就全靠與一箇別的民族互相接觸，遇見了別的問題需要解決，才能促使牠進步；尼羅河流域，雖然是文化萌芽的地方，可是在其他流域所發展之文化，卻比牠更形進步。等到尼羅河流域的居民已經解決了自己的特別問題—征服了他們自己的環境以後。那包圍著他們使他們和別的民族隔絕的沙漠，就變成了文化上很大的不利了。如是文化發展就起了停頓。一切的生活如法律

、文學、宗教、習慣等，都成了停頓不變的情形。這種停滯，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相同的，只有中國（因爲情形相似）略可比較。

所以廣義的說來，沙漠除了用人力灌溉的方法（假使可能）征服外，終是人類發展中的障礙物。人類不能在沙漠中生存，卽使能夠，也只能生存極少數的人，或者在耗費鉅量的精力以後，方才可容納極少數的人住；一個人甚至不能渡過沙漠，要渡過去，不知要費多大的力量。自海洋被人類征服以後，沙漠就是妨礙人類互相交通的最大障礙物。照猶太的神話說，上帝的選民從埃及逃出後，在那裏漂蕩四十年，這個沙漠，在歐戰時還是運用二十世紀新軍隊的大障礙。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四面圍著大海的美洲受地理的影響如何。

當十五世紀末，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美洲時，在那裏他們只尋了一二處地方略有些文明，而那些文明也是很原始的，與歐洲五千年前相

等。這是什麼緣故呢？使美洲的土著只發展到那樣程度的文化的，在地理上當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其中一箇最大的原因，卻顯然就是美洲與外界隔絕。美洲東西兩岸，都是大洋，與舊世界的人民完全隔絕。舊世界的人民學會了在內河和內地海的航行，雖是已有一千年，但是大洋對於他們仍是顯然的屏障。美洲土人，在這種天然屏障後面繼續酣眠。或者說得更精確些，以一種極遲緩的步伐向前進行，所以大洋在牠是一箇屏障時代，牠是一箇有利的地理要素，正像埃及的沙漠一樣。在他已經不爲內部的太平洋的重要保障時，牠就成爲文化發展的最大障礙物。

但是現在美洲的地位，對於東西大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關係怎樣呢？自哥倫布航行大西洋至現在已有四百多年了。在這過去的幾百年中，他漸習航海術，把海洋由屏障一變而爲遠道各地的連繫者；在這幾百年中，從歐洲帶去的文明已在美洲生了根，以可驚的速度發展起來。

牠形成了歐洲的文化的外圈，用大西洋把牠和歐洲聯絡起來；在西面，牠有與海岸線平行的山脈作天然邊界，使牠與外面的大地相隔絕，最初工業發展的基礎是因著新英倫和本色范尼亞幾州的鐵機水力而建築起來。在陸地交通未興發以前，那些大西洋邊的幾州，已經到了在經濟上可以脫離歐洲而獨立的地步。所以在政治上，他們也就可以宣佈和保持自己的獨立。以後，就到了鐵路興發的世紀，美國向西進取，直至最後達到太平洋邊。東西二部雖因阿利給尼(Allegheny)山脈的橫斷使河流都向南流，但此時因有鐵路就能互相聯合起來了，鐵礦和煤田也因之聯絡起來。山以西的食料產地和密西西比河一帶的畜牧區域，能將食物送到東北部工業區域或南方產棉的地方去。十九世紀末，美國最大的資本家已經將『大湖』和墨西哥灣間大西洋和土地統治起來。并且還想去征服別的新土地。一八九八年美國銀行公會會長在其年會席上演說辭中有一節

說道：『我們在商業競爭上操三項勝算，就是鐵鋼和煤，我們以前好久是世界上的穀倉，我們現在要作世界的工場，以後我們要做世界的賬房』。到了今天，北美洲的美國已成列强中最重要的一國了。美洲的地位，一岸濱大西洋遠望歐洲；——一岸臨太平洋遠窺東亞，比歐洲諸工業國家尤有特別的優點。他剛站在舊世界的兩邊，有海洋航路從他東西兩岸的海口直達各地。現在海不但不是一箇礙障。反成爲有利於美洲的地理的動力了。我們再引證英國及其地理上處在歐洲西北部的位置，來作最後的說明。大部分的英國人以爲英國之所以稱霸全球，一部分原因，是因爲牠地理上之位置特別地適宜。然而英國的地形，幾千年以來未嘗有變更，而何以獨在最近二百年以來英國特權階級的權力才異常擴張，稱雄於世界呢？

我們就英國和埃及來看，知道地理上的利與不利，只對幾樁事情當

中的關係來講的。這幾樁事情就是這箇地方的，或這箇地方鄰近的人民在工藝上和經濟上發展的程度。幾千年來，人類歷史都集在地中海旁邊；那就是說地中海的土地，在社會上，工藝上，經濟上，都會有極大的發展。英國在這種時代內，牠的人民所處的地位是很不適宜於發展的；因牠那時是被摒於商業區域之外，離重要路和中心地都很遠。而菲尼基人和羅馬人相繼侵入以前，他在世界地圖上簡直沒有位置。英國在羅馬人統治之下的千年中，還是落後的國家，等到商業由地中海發展到萊茵河流域時，漢薩同盟的商人，方將北海及波羅海開闢爲第二內地海。英國在這時候方才漸與接近，而爲從地中海起的商業的路線的西北終點，但只是終點而已，並不是一箇中心地。等到後來大西洋開闢，美洲發現，商業中心從地中海遷到大西洋沿岸，這時，在歐洲西北部佔有大西洋海岸線，而不囿於地中海這狹小世界以內的國家，方才在政治上，商業

上，佔最重要的位置。在這時候，唯有這時候，英國的位置才於其本身有利；從那時候起英國才逐漸發展，稱霸歐洲，而至於稱霸全世界。從前牠只是躲在冷港內裏，現在佔據著大街的最好的位置了。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地理環境有時幫助了人類的歷史發展，有時卻又有力於停滯歷史的發展。然而人類征服自然環境的能力的增加，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不斷的進步，使地面上天賦優惠與天賦不優惠的地方的差別，已經減輕了。我們且看人類如何征服自然，我們單拿陸路的交通來說罷。

歐洲從地中海發展的初期，到十八世紀末，陸路運輸工具，差不多不曾有什麼變遷，以十九世紀初，歐洲所用的『驛車』（一種乘客的大馬車，是那時來往兩地的主要的交通工具），與三千年前侵入地中海的野蠻人所用的戰車相比較，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差異。實在講起來，非但

沒有進步，並且退步；比如羅馬人所造的道路，就一定比後來的幾世紀中直到十九世紀時歐洲人所造的道路好的多。

陸路交通的新紀元，自然是從用蒸氣機開始。

『蒸氣機的最重要的效用，就是牠(相對的)不受種種氣候上的束縛，而能應用於無數的事業上，牠可以用著在礦中抽水，轉動工廠裏的機器，可以轉磨，掘隧道，造屋子，築隄，船中起貨，把巨量的貨物，從一處運到別處，走海洋沙漠和森林等等……。自一八一五年以後，這種蒸氣發動機，就從英國很快的傳到歐洲各地去，而一到了大陸以後，又被應用於陸路運輸，負重行速，於是傳佈益廣。在蒸氣發明以前，人類種種活動，都被山嶺、沙漠、氣候變遷，路途遼遠等所限制。蒸氣機使人類能將這種種困難征服，而爲人類管治天然的重要工具』。——Knowles，十九世紀美國工業及商業革

命。五—六頁。

到了十九世紀之末，人類非但比從前更能統治海洋，而且他還能將從前文明所不能及的大地，逐漸開發起來，並且各地方互相往來的路程，從時間上來說，縮減到從前最好道路的十分之一。

在沒有鐵路交通以前，非洲的運輸方法只有一種，而且是極原始的——人力的負荷，因爲非洲有一種毒蛇，名爲蠐蠐，爲害牲畜極大，馬是不能生存的。『非洲臥在大洋上面，像是大陸的一箇胴體(Torso)沒有頭，沒有手足四肢，也沒有靈性。在這裏，形式是沒有變化的，地理的條件是單調而沒有變動的。人類簡直已經忘記在這塊土地去生長了』。

但是蒸氣時代一來以後，就連臺排演了。列强都窮搜四海，發狂似的急急乎要找一塊地方來發展，找一點原料來剝削。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中，有一本歐洲人的世界地圖册，那裏面所畫的非洲，只有一箇海岸

線，在這海岸線上，密密的寫著許多地名，而非洲的腹地卻差不多全是一片白——河流的上游，是用很草率的虛線畫著的，山脈是疑假疑眞模糊不淸地安置著的。其他更不必說了。非洲土地之分割，始於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在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的十年之中，差不多全非洲的一半已被歐洲的列强併吞了。到了十九世紀末，分割的手續，已經完畢，於是非洲的地圖，就一塊塊地染著歐洲的顏色了！

這種併吞殖民地的大活劇，在鐵路未建築以前，已經進行，不過這種併吞的結果，只能在重要的鐵路建築迅速成功的以後，方才可以鞏固。非洲之成爲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全是因爲有了鐵路。

南北美洲也是一樣，在未有鐵路以前，祇好算是光有一箇『有居民的海岸線』，內在的大陸雖然存在，對於歐洲人是若有若無的。南北美洲的河流，在內部交通上，確乎比非洲便利得多了。但是在北方的加拿

大，河流在一年間有大部分的日子是冰封的。在美國密蘇里密西西比河流，長數千里，支流繁多，成一大系統，但是這些河流，大都是由北而南流，對於橫貫東西的大陸交通是毫無裨益的。在南美洲呢？最大的河流，大都流經赤道帶，那裏的氣候，對於白種人剛正是最難生存的。有了鐵路，加拿大才開闢起來了。有了鐵路，像美國這麼大的一塊陸地，方才在政治上能夠起來了。也是因爲有了鐵路，南美才成爲在經濟上有極大希望的一塊陸地。

『我們記得，在一七六三年，英國曾起了一種非常激烈的爭論：在七年戰爭之後，還是保留加拿大好呢？還是保留瓜臺洛泊(Guade Loupe)和馬丁尼克(Martinigue)好呢？』——Knowles，一八五頁。

這兩處地方都是西印度羣島中很小的島。可見在那時，英國人對於加拿大的天然富源簡直沒有夢想得到。並且對於加拿大的開闢，認爲何

塞斯卡切宛（Saskatchewan）阿爾伯第（Arberta）等省去，一定要走海道，從赫貞峽進赫貞灣，再用小船，溯河而上，並且要在海面不冰凍的時候，這條路才好走。至於加拿大更避遠的部分，那麼與其由美國走陸路去，還遠不如由英國的水路去的便利了；甚或由加拿大東部到加拿大西部，還不及由英國到加拿大更便利。這種情形，直到一八六〇年還是一樣。這是在鐵路建築了以後，加拿大方才現代化起來的。也是在鐵路築了以後，加拿大與美國才一天比一天密切，而英國與加拿大間的水路交通，反形落後的。

加拿大的歷史，大部分是美國歷史的複演，一七七六年對不列顛宣佈獨立的十三洲，僅僅只是一條狹長的土地，自大西洋的海岸起，到阿萊下耐山（Alleghany）爲止。不錯，法國人沿聖勞倫斯下來，溯密西西比

河（Missisippi）及其支流而上，是曾在美國零零星星的築了一些礮臺和驛站。但是那時的美國，實際上不過是大西洋沿岸的數州而已。十八世紀的前半期的美國歷史，是一段不斷向西發展的歷史，先到密西西比河，再到落機山邊，然後越過了山脈的阻擋，直到太平洋海岸。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在政治上所以能夠起來，是由於有經濟上的互相依賴爲基礎，而這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又祇有在鐵路發達以後才可能的。『對於美國，統一的意義，等於向西進展，而鐵路就是進展的唯一工具』。——Wells: 世界史綱，Chapt 39.

歐洲的鐵路，大部分是去聯接那些已經存在的城市的；決定那些城市的位置的，在從前是驛道的路線，現在有了鐵路，他們中間互相的關係也就變更了。有些城市是處在鐵路交叉輻奏的地方，因而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有些城市不當鐵路的要衝，地位就逐漸衰弱了。比如英國的

阿屏頓和里定兩箇城市，阿屏頓居太晤士河邊，爲從前交通的要道，但至鐵路的幹線經過鄰近的里定鎭時，牠的位置就漸漸地爲里定所奪去了。但是在美國，市鎭大多是在鐵道旁邊興發起來的。『祇有大西洋沿岸一帶，因文明已經存在，所以算是例外，至於其他的地方，鐵路並不管他們重要不重要，祇是向著那項沒有阻力的地方走，這樣縱一條，橫一條，在某幾點上自然而然互相交叉，比如在芝加哥，於是大家覺得住在芝加哥最便利。這箇城市就此興發起來。』——范格里夫：地理與世界列强，326頁。

北部亞細亞洲的大平原——古遊牧種族的家庭——亦是這樣開發起來的。西比利亞鐵道經過這平原，將歐俄和太平洋邊岸接連起來，而沿鐵道發生了市鎭了。高加索鐵道和裏海鐵道一築成，而亞洲大陸古舊的腹地開闢了。『印度因有了縱橫交錯的鐵路而發生變遷，饑饉已經減少

，舊的階級開始破壞。』（Knowles. 187 頁）。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及近東各地，都因有了巴格達特（Bagdad）鐵路而變成了被統治的地方。對於中國交通，也因鐵道的建設而更加迅速。

這些廣大的陸地，怎樣的被鐵路連繫於文明的世界，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再來看一看，這箇新的陸路交通工具，對於那些早已形成的『民族的國家』在某種互相關係上，發生怎樣的影響。前面講過了，鐵路怎樣在一箇新的國家（美國）裏面建設起一箇偉大的經濟勢力基礎來。但是在歐洲本身，鐵路也曾大大的變動了各國間勢力的平衡。在十九世紀初，『只有英國和法國可以算得巨大的經濟勢力；到了十九世紀之末，中世紀的德國和俄國也是變成現代的國家了』。（Knowles, 8 頁。）這兩箇國家，從前都因爲海岸線比較短促，陸路交通十分困難，所以不能發達，在俄國因爲缺少石頭，不能建築很好的道路，所以這種困難，更

形增加。這兩箇國家的位置，比起歐洲各國，自然是很不利的。但是鐵路卻大大的補救了這箇缺點。牠使牠們能夠匯集各種生產原料——就是說將他們的煤和鐵搬在一處，牠使牠們能夠支配牠們食糧的需給。『鐵路使德國變成中歐最大的貨物分配者，使俄國在海口冰凍時，還有鐵路可以出口。英國由於海運的便利，所以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差不多是北歐與地中海間貨物運輸的壟斷者；在這時期以後，大半的貨物，可走陸路，由德國轉運著了』。德國三B鐵路，（Mitte Furopa）的大計劃（從漢堡一直到波斯灣，接連巴格達特鐵道）倘然成功，那牠對於英國經過地中海、蘇彝士運河的主要海道的位置，定加以極重大的打擊。

鐵路使德國各小聯邦的分界漸歸消滅。在美國和印度鐵路築成了政治聯合上的經濟基礎。也是有了鐵路，大陸內地的俄國，方才從落後的中世紀國家裏，蛻化出來。德國雖然處在歐洲的中心地位，俄國雖然有

廣大的土地，如果沒有這一步技術上的新進步——陸路交通的發展——牠們依然只好落後的。

我們已經講到現在的世界了，這世界現在已經包括了地面上凡是可以住人的一切地方，而再不僅僅是一箇爲地理所限制著的文明的『孤島』。四週被一箇極大的不可知的空間所包圍，時時有不可知的野蠻人來侵襲的危險了。我們已經一步一步的跟著歷史走，看見人類的互相交通，總是一步步的密切。幾世紀以來，從河的流域到內地海，再由內地海到全世界的大洋沿岸，最後更深入各洲大陸的腹地。

現在世界和以前任何時代的世界相比較，頂顯著的分別，就是在世界上的經濟依賴。海道和鐵路多少的將世界上各部分密切的連接起來，每一箇地方總或多或少的依賴別箇地方的貨物供給——食物、原料、或燃料。封建時代之自給產業和十八世紀差不多能自給的不列顚，都同著

奴隸，農奴，行會的手工業者一齊過去了。現在的工業的城市小至於英國的中部的呂登（Luton）也要依賴遠隔太平洋的日本的某地方來供給主要工業的原料。一箇英國的普通人，如果能夠置辦早餐，他的桌上總有美國麥做的麪包美國中部西岸出產的醃肉，從丹麥或西比利亞來的奶油，從中國或印度來的茶。在各箇國家內，各地方生產的專門化，也在往前進行，於是而有農業區域與工業區域的分別，造成一種互相依賴的地位，——例如，南威爾斯（英國）和魯爾（德國）都是產煤或產鐵的區域，東英倫（英國）和東普魯士（德國）都是產麥的區域。這種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是根據於這箇原因而造成的，海陸交通的發展——人的交通工具的發明，人的征服自然，征服地理限度的表現。

地理動力，如果單拿本身的變遷而就某種意義上來看。可以說是不變的。在過去是如此，在目前亦是如此。無論如何，在人類歷史的範圍

以內，卽遠在人類歷史發生以前，地理上的各種主要事實——水陸之分佈，氣候之不同等等——大致說來，總可以說是古今一致的。但是我們切記不要把地理動力認爲絕對的東西，我們要了解兩者間的交通影響：一方面是人類，他們慢慢地發展起來，征服他的環境；一方面是那環境的本身，牠不斷地給人類以一切新的事實叫他們去做，一些新問題要他們去解決。到了他們把環境的這一點那一點征服了後，從前是障礙的，現在變成了他們的階梯了——從前曾做他們的鬬爭的對象的，現在變成了他們的同盟者，幫助他們去和別的障礙鬬爭了。

所以歷史的地理動力只是客觀的。缺乏一切自動的活力，要與「人類技術能力的繼續之發展」連繫起來才能推進歷史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Hannabeu: Outline of the Economical Geography of the world.

Rappor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s a Science of Evolution.

Fairgrieve: Geography and World Power.

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America in 19th Century.

第三章　心理動力觀

戰爭、革命、和罷工都是繼續存在人的頭腦中的事件，不管有多少的頭腦乃是爲機器、土地、與人口所決定的。——布藍克霍爾（H. Blankenhorn）

這箇格言是那些把許多人引入迷途的似是而非的話之一。在表面上，牠是十分對的，然而關於爲什麼那些東西『繼續存在人的頭腦中』，或者怎樣跑進人的頭腦中而得以『繼續存在』，這種問題似乎沒有使布藍克霍爾感覺一點點或絲毫的興趣。但是這種問題恰恰是那使眞正的歷史學者感覺興趣之點。一箇人可以有一種無須從什麼地方就可以獲得知識的觀念，他就是一箇無知識的人。換言之，無知無識就是進步的制動機，所以也是我們要討論的另一種因素。更正確的說，無知無識就是心

理要素（Psychic Factor）的另一種形勢。在這裏編造一箇詭辯家所歡迎的半唯心的蛛網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的目的是要把頭腦弄清淅，不是要把牠弄得更混亂。思想幷不是物質世界的一箇『反映』，但是主張思想不是起原於社會的與物質的環境中，那眞是一箇勇敢的人。

學校的歷史教科書，如人人所知的，是對於曲解歷史成爲箇人勳功偉業的記錄頗有影響的。牠的好的，壞的，以及無關係的大人物與英雄們大半都是寄生蟲或劊子手，他們的事業是那種令人沮喪的罪惡的可怕的記錄。在那帝王政治史與牢獄囚犯紀載之間是有一點差異的。但是這種對僅僅箇人的著重對於青年心理有一種適如所需的影響—牠終身拘守著一箇錯誤的歷史觀。我們尊重巴克爾和格林（Buckle; Green）（都是英國十九世紀歷史家。）的事業與遺名，乃是因爲他們最先攻擊這種奇怪的觀念的。對於箇人有些事是要說的，這會使我們注意那心理動力的

另一種形勢。偉人是比較斯賓塞的學說更使我們信仰些的。我在說及凱爾哈地的那段文字中所暗示的，還有人格的問題。人格是不可以打扣折的，顯然牠不接觸著那文明的發生是因爲財富生產的技術的發展的重要事實。人格常常是歷史中的『偶然的』動力。巴斯克爾（Blaise Pascal）說，如果克妮娥帕特娜（Cleopatra）是一箇醜陋的或愚蠢的婦女，『（有記載的）歷史的全部進程就會是不同的』。乃是十分正確的。他的眞實的意思乃是她就不能迷惑凱撒與安唐立，同時必然的，這三箇人的各自的詳細的傳記必然與他們當時所有的迥然不同。但是在同樣的意義中歷史必然是很不同的，假使克妮娥帕特娜叫做克娜曼丁娜（Clementina）。

因爲她是一箇艷麗的婦女，一箇托羅城的漢倫第二（我們假設承認是如此），她便獲得了一箇對『羅馬的公然的姦夫』的暫時支配力，把她從一箇埃及的仇敵變成了一箇朋友。所以，如果歷史不是記載克妮俄

帕特娜獸慾的艷麗與人類的狡詐，則歷史會是有差別的。但是，讀者們，你們見到了那些在軍事領袖統治之下的爲帝國服役的成千成萬的末開化的人，那因寄生制度使羅馬之日漸衰弱，那耗盡土地財源的奴隸動產制度（Chattel-Slavery）的方法，以及那些使革命尖銳化的圓劇場，酷刑的法庭，磔刑，和監獄等等的慘狀，你們會一下子眞信克妮娥帕特娜的鼻端對於文明的最後的進步有點影響麼？不，那是不値半文錢的，封建制度是必然要到來的。羅馬必然要毀滅的—不是由於歷史中某種宿命論，而是因爲羅馬帝國內外的經濟壓迫推動和强迫著那些促成他的顚覆的大運動。

復次，人格是一箇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問題，或者—如某些人所斷言的—骨相學的問題。一箇好人會由遺傳得到拙劣的腦質，但在起作用時卻可以舉止咸宜。一箇壞人可以有性質最優良的腦質，卻缺少某種主要

的道德要素。這兩種人都會受環境的影響。然而，那極有害於一箇人的品性的環境對於別人會是沒有壞的影響的，我們無需專門討論這一點。人類就是這樣的，不論智愚。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有時是好的，有時是壞的。那神聖的和道德破的在已成文的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痕跡。關於此點，我們可以來推究，如果拿破崙與華盛頓的性情是同樣的，那會發生些什麼事情，這樣的推論會是暫時容許我們，但是到了最後，我們必然得著這箇結論，就是由人格的變動所得來的結果和實際所發生的不會有什麼不同的事件。凱撒是比較這兩箇人而更偉大的人物，他一旦不用心計劃事件的時候，那就是他下臺的預兆了。偉人就是偉人，因爲他的固有的價值，精神上的或心理上的，或是兩者同時的價值；同時因爲他適於完成那些當時他的和當地的社會條件所需要的勳功偉業，他才升到頂點的。

這不是單說那成功的人；我們可把這箇格言用應於那箇他的當時和當地的人曾用石擊死他的，後來又爲他樹立了紀念碑的偉人—伊立歐特(Sir John Eliot)。他是像克倫威爾（Cromwell）一樣的高尙、勇敢，大概也一樣眼光遠大的。他像那在他傍邊的卑賤的囚犯一樣無力的死於監獄之中。另一方面，克倫威爾實際上成了一箇王。在這種研究伊立歐特和克倫威爾的各箇的特性來作任何的說明，都是十分愚蠢的。那原動力在這兩箇情形中都恰恰是同樣的。原因就是爲一種宗教理想所默認的階級戰，同時在那次階級戰獲得了使內戰發生的充分的動力之後，克倫威爾首先成了軍略家，騎兵領袖，以及一般人的領袖的眞正出類拔萃的人物。作爲對歷史和進步上『心理因素』的影響的例證，我不知道有比較克倫威爾的例子而更好的例子。如果有一箇人正眞被稱一箇被『生活力』所煽動的『主動者』，那箇人就是克倫威爾。克倫威爾把一羣莫明其

妙的人練成世界上最大的戰鬬力，進而用那箇力去作最大可能的勝利。在二十世紀中，歐洲對於這位例外的天才的崇拜或憎惡一年二年的擴大了。然而有什麼人要想反對這根本事實呢？—就是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克倫威爾在行動中乃是革命的資本主義的化身？我們討論克倫威爾的時候，我們最後是討論經濟。

克倫威爾的天才與資質是眞正的革命的。『革命者』根本就是一箇實行家，而這箇實行家常常表示蔑視主義與戰線的傳統的公式、語言，與定律。你屬於參加革命中的那一部分軍隊和關係於你那一邊是那箇時代及歷史的發展，那是難得知道的—但是你總在要使那箇軍隊行動起來乃至戰勝。戰略的問題在這裏就發生了。除非直接的軍事危急而外，克倫威爾從沒有指揮過他的戰爭。如果里托夫斯克（Brest Litovsk）的『情形』是極正當的，則列寧不會注意社會主義的著作。在這一點，克倫威

爾與列寧都是眞正的實行家——革命者，因爲他們兩箇人都知道他們所要做的是甚麼，同時他們兩箇人運用他們的豐富的常識去探究。那麼，這就是在人生問題上面工作的『心理因素』。精神的『原料』就是智識。如果智識不是爲一定的目的而獲得的，那是無用的。爲欲反應於社會而蒐集智識的人乃是幫助製造歷史——及進步——的人。這裏還有一箇特點。戴通城的建立者曾經造成了歷史。他們也是實行家。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去分辯了。知識必在智慧的行動之前。智慧的行動——是精神對於我們現代與後世（心理因素）的問題的應用的結果——推動著進步。非智慧的行動就是停滯的意思。所以，人可以依據他的才能、能力，天才的程度與力量阻撓或促進歷史的運動。

我們再來回頭看一看，一般歷史之心理動力論者如何解釋歷史。他們往往以『人性』——抽象形態——作爲人類歷史的解釋。如非爾古蓀（一

Ferguson）在其所著之『文明的哲學』中說：『社會生活爲人類有機體之自然的結果』。康德聲言歷史是一切人類機能的底發展。約弗諾(Jouffroy）曾經明白地承認『人類縱然沒有哲學家，也不會是不動的，並且沒有他們，革命還是做得成功的，不過發生較慢罷了』。卻又發生這樣的論調：

『行於人底條件中的一切變化，人的條件所受的一切改變，都從悟性中推演出來，而成爲他的結果……。確定地說來，慾望只在各種人民歷史的表面上活動，其原則屬諸思想』。

覃恩（Taine）對於歷史只看見一箇心理的問題，但是卻還不滿意於以常人之一般本質來解釋歷史。他說：『我不相信一箇歷史家，沒有預先研究出神、靜坐、幻覺，推理的反常而能夠有一種純淨的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印度思想』。

一八五一年拉薩魯斯(La Zarus)和斯擔達爾(Steinthal)建立了集體心理學之後，心理動力論者的學說進到了一箇新時期了。拉薩魯斯在其所著之『羣衆心理學的研究』一書中，表現他的歷史觀是這樣：

『人類的歷史與記述科學相同，……他不也要求成爲類於綜合的自然科學底科學麼？牠沒有爲使牠可以綜合地表現之意，而把牠服屬於若干法則這種理論的需要麼？那末，何處才找得人類歷史生活底生理學呢？我們的答案是：在人民的心理學中。像箇人的傳記根據於箇人心理學一樣，歷史這種人類的傳記，就應以人民底心理學爲合理的基礎。因此，心理學之於歷史學，正同生理學之於生物學』。

集體心理學距離去其創立者所期待於牠之一切底時候還遠。然而牠在解釋上的價値，卻不可非難。心理觀可以把牠當作牢固的支柱，爲其

將來向他求得滿盤的預約。歷史哲學遂由他，而密切地連接於更有關係的心理學問題。並且心理學的一切進步，都必然在歷史哲學領域裏立刻有一種回響。羣衆的心理學，階級和集團的心理學，應用於社會行動某些場合之擬議底假設，和集體的自動擬議底假設，都給科學的好奇心展開了很多的原野，同樣也就有很多的機緣，使一線光明放射到我們的歷史命運底黑暗中來。

對於認人種爲決定民族中的箇人而由此開始他的歷史進化底因子這種理論，可以看作生理觀和心理觀底一箇變種。奧國社會學者甘蒲羅魏基（Gumplovicz）底『人種的鬭爭』，大概是受了組成哈卑士布爾（Habsbourg）底帝國那些民族之無止境的鬭爭的影響而寫出的書，在科學界中，只有一點微弱的回聲。那些無信義的熱中的政治家，到據有這箇理論來挑唆野蠻的仇恨，而滿足其不敢自認的野心。在我們，似乎這箇毫

無科學性的事實，就爲大家對於那種理論予以冷淡的一箇原因，儘管牠表示得誇大，其應得之最好的命運也不過如此。

心理動力論者只認識『人性』是歷史的動力。他們隨便那一派，都有在人類動機裏，或者在需要或感情裏，抑或在思想裏，看出運動的根本原因。照這一派人說來，是神智，照那一派人看來是觀念，是決定人的歷史命運的原動力。人不過是這些高級力量之柔順的工具，在這些指導力量和歷史實際之間底中介。他們只是在絲毫沒有連繫著箇人或集體的動作的人，卻單獨呈現一種事物的，感情，慾望的，和思想的統系中，去找歷史。『人類的歷史唯一的行動的因子。死的力量，所謂客觀的，在歷史中，應該看成這箇行動底條件和方法，從不能看成獨立的存在，看成歷史實體的一種』。對於這箇起碼的思想，而發生了蔑視，就要發生上述之錯誤了。

對於這種幼稚的見解，最好應用漢波爾特（Humbolht）嚴厲而恰當的批評：

『這箇學說不尊重普遍的歷史。牠把歷史的悲劇，降低爲日常生活中的齣幕，敷淺地從特別事變所連繫著的全部事實中取出特別事變，而把由箇人的動機所做出的表演，放在世界命運的位置上』。總之，心理動力論者的缺點是在把歷史影響中之一部分人，當作全體，進化因子中底一箇，當作全因子，以爲這以萬能的影響，支配整箇的歷史。

我們決定人的生活方式原來不是他們的意識；反是決定他們的意識的卻是他們的社會生活。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已經進到這些力的發展的某一階段的時候，他們就和老的生產條件反對起來，或者用法律的術語來說，是和老的財產關係。以前這些力量是在其中起作用的。他們的古

老的財產關係不再是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制度，而成爲阻礙了。就來了社會制度變革的時期，由於經濟基礎的變化，那全部巨大的上層組織多少是速迅的變化着。

那種改變的事業就是人類─箇人和羣衆─的極需要的工作，至於他們怎樣能夠坐在一箇『階梯』上去變化那人生的、社會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精神的過程，我們的腦筋是想不到的。總結一句：人類，由我們所說過的方法，創造他自己的意識，但是在創造牠的時候，他們沒有什麼奇怪的理由，仍是歷史過程自由的工具，這種過程是從人類接合他自己去由自然界尋求那得之則生不得之則死的食物、衣服、住宅，和安全的時候就開始了的。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Rappopor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s a Science of Evolution.

第四章　道德因素問題

「道德因素」這箇名詞，讀者們可以認爲是包含於那在人類的社會關係中支配著他們的活動的倫理的和所謂精神的觀念。讀者不要以爲我在述敘一切心理學的妄語，討論心理學的分析，和比較宗教的論文來使你們厭倦。那種資料的十分之九是和那迷信者的麻醉一樣的迷惑著頭腦。就歷史而論，常識或健全的常識的使用是最需要的。「道德的因素」只是那出自物質的生活基礎的一般的理想的一部分。牠不是一箇固定的和永不變的東西，而是在經濟的基礎中不定的變動著的。五世紀以前認爲是道德的，現在就不是道德的了。現在認爲是道德的，在數世紀或更近以前認爲是非道德的。復次，在歐洲認爲是道德的，在亞洲卻是不合於道德的了，反之亦然。所以地域和時間都是有關係的。在不列顛，一

箇裸體的酥胸，除開上等的社會婦女以外，必然令人驚奇的。在南洋羣島卻又不認爲奇怪了。土耳其的婦女看見裸露著口部在外面行走的歐洲婦女是極無禮節的動物。一夫一妻在這裏是道德的；一夫多妻制在那裏又是道德的了。又有一時在鹽湖市也是一樣是道德的。一千年以前，高利貸的剝削被認爲不道德的；現在卻是歐美資本社會倫理學的王冠中的最漂亮的寶石。吸鴉片對於基督教徒是不道德的，但是利用基督教的艦來强迫中國人吸鴉片又是十分正當的了。道德的因素是一箇不可思議的產物。

從前，人吃人的風俗，殺小孩的風俗，以活人爲祭品的風俗，乃至於奴隸動產制度都是合於道德的制度。在現在的歐洲，那些都多少被視爲奇怪的了。在幾世紀以前，焚燒活人，把碎或敲斷他們的骨節乃是非常道德的，因爲他們的數學『思想』是與那些他們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指

導者所支配的思想迥然不同。現在有些人認爲節制生育的書籍是一種可惡的精神上的毒物，但是同樣非難這種書籍的有道德的人卻是那些要避免身心中酒毒的人的死敵。若說節制生育的宣傳不是一種有利益的，而後一種卻是有利的，那就會被不客氣的反對的。那只是道德因素的特性的另一種表現，這種特性有時弄得難以知道一箇人是不是基督教徒的件侶或是誇大者的件侶。這種非常有彈性的而適應環境的本質（假使牠是一種本質）稱爲道德因素的不獨因時因地而變。而且很奇怪地和同類中的各各互相直接的矛盾著。我們常說，『利於甲者未必利於乙』。那被認爲性質樸厚的人們知道他們自己是各自反對的，因爲這一箇人的道德觀念並不是那一箇人的道德觀念。

在斯巴達，人們奬勵偸竊，有時也責罰扒手，那是因爲這箇扒手偸竊手段太笨。假如有人能夠巧妙的偸竊，那末斯巴達人就認爲這箇人可

以訓練成爲膽大細心的戰士，因爲當時斯巴達需要這樣的戰士，以防意洛特人的叛變幷抵抗波斯人的進攻。在斯巴達，根據李古爾格(Lycurgue)的法律，誰也不能保持著多量貴重物件。偷竊是不會特別有害於斯巴達國家的，實行偷竊還可以訓練斯巴達人，使他們將來能夠好好的保衞國家。所以偷竊一事，在富有的民族認爲有害，而對於斯巴達則是有利的，則是可以得到奬賞的。以遊獵爲生的野蠻人，將他們那些不能追隨獵羣前進的父老都殺死，因爲他們認爲這些老人旣然跟不上來，一定要死在半路，那末，爲人子的義務就在自己殺死他們，免得他們爲猛獸所吞食。可見我們認爲極端殘酷的和不道德的事情，在野蠻人看來，反是非常合乎人道和道德的行爲。

同樣的行爲，對於這箇時代和這箇地方是有利的，就受人尊敬；反之，就受人輕蔑或攻擊。人民的利益不同，其嗜好也就不同。加來伊卜

人（Les. Caraibes）說：『除了歐洲人外，我們未曾見過其他的野蠻人；這些歐洲人竟一點也不遵守我們地方的習慣。』這話在他們說來完全是對的，他們正是拿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如前所述，土耳其人認爲婦女不帶面幕出門是不道德的，而要受官府的懲罰。但此地官府同時又要青年婦女於戰爭時一絲不掛地上戰場來。在和平時，不帶面幕的婦女將誘惑男子使之不能專心經營經濟上的工作，因此她們對於國家是有害的，因此這種行爲是不道德，而要受懲罰的。但在敵人進攻而本民族發生危險的時候，裸體少女之出現就將激發青年人的熱情，鼓動他們的勇氣。因此，這些婦女就有利於本民族，就做出合於道德的行爲。

在現代的社會中行爲的三種定型的誡律或規律就是法律，道德，與態度。第一種是以强迫遵奉他的權力爲後盾的。第二箇是無須那樣强迫的，但是牠的存在在於輿論的勢力。那第三箇就不能這樣討論了，牠不

過是禮儀等等而已，無所謂合法或道德。只要法律與道德是附屬在人羣或部落的利益之下的，牠就是正當的，因爲牠是功利主義的。因爲更要看重牠們便將牠和宗教聯絡起來了。部落的人民不獨爲這世界中的責罰，侮慢，或流配所威嚇而且爲那些要降臨到他們的身上的殘暴的鬼神的忿怒在現在與將來『開除教籍』所威嚇。初期的法律起源於『誡律』，誡律乃是人類所生出的最强有力的紀律之一。羅伯特班斯（Robert Burns）寫著下面的詩的時候，是十分合於科學的：

『地獄的恐怖是策死囚們的鞭，

使這些不幸之人循規蹈矩』。

然而，在時間的過程中，『地獄的恐怖』是被一箇有組織的警察隊所代替了。這並不能防止那種的事實，總有那種的高尙的人既不要法律的實際强制，也不要迷信的妄談的恐嚇而使他們『正直』。例如，那些

人他們遵守著這樣的規例的：

『你覺得你的光榮所緊依的所在，

讓那就爲你的約束吧』。

然而，我們所討論的乃是歷史的運動，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在某一時代所認爲『正直的』，在別箇時代反視爲是『不正直的』。沒有人會很愚蠢的說，因爲中國的孔子在耶穌降生前五世紀傳布了『金箴』，世界史會從那天起因那句名言就走到不同的方向。

如果初民的集團是因共同的利害而結合的，則法律和道德不只是必要的而且是對的。法律和道德都是起於自衛的自然法則——就是那一人羣與部落的保持。我們也可以確信這兩者極迅速的反映出這些利害，同時確信那些法師，星士，僧侶會常常說神的意志就是部落的利害所表現的。因爲服從這種意志就堅固了團結，那種服從就是好的。不服從就不

好，因為不服從就會使集團衰弱。

一時部一箇『生產方法的變革』到來了。我無須詳細的討論這箇。社會不落財產的私人支配引起了將人類作奴隸的特權階級的寄生主義。及再是純一的，不再是含著共同的利益的一箇結合體。奴隸的領主——奴隸，產生了。後來貴族——及傭傭與自由民，產生了。現在財閥——及被剝削的勞動者，產生了。也有一箇聰敏的『道德因素』說的專家能夠告訴我們在這裏道德因素要怎樣起作用呢？如果一種思想對於奴隸領主是好的，牠對於奴隸也是同樣的好麼？如果資本家的法術士說『在長者的前面要表示卑躬和尊敬』乃是好的道德或宗教，那工資的奴隸也會承認這話麼？總之，一個最合於豺狼的道德習慣也同樣的合於綿羊麼？

然而，法律，道德，與宗教在那貧富人羣的等級發生的時期就已經變革了。牠們已經變革了，而且我們可以決然地說，牠們每次『多少是

急速的被變革了』，那變革是與那已經和正在代替著社會之經濟基礎的根本變革同時發生的。你可以知道這箇變革是起於新興階級的智慧的活動與財富生產的種種方法，這箇新興階級已經發覺那已產生的法律，道德，和宗教是對他們的進展的障礙。

當人們爲『對赤道的侮蔑』，如散德萊思米斯（Sidney Smith）之所說的，而被處以烙刑的時候，當天文學家和其他科學家因太精密的探究自然的祕密而入獄和被殺的時候，那對於新興階級如商業階級的發展是很困難的。那箇階級是被中世紀的教會安排的種種的限制所束縛了。牠的發展賴於科學研究的自由與在某種限度中的信仰的自由。這些都是教會所禁止的。這箇新興階級的經濟的豐裕就是商業化；讀產的方法就是貿易。握權的是封建的貴族，其財富卻爲土地。當新的制度發生了，那是不得不與舊的制度衝突的。當這衝突發展了，一箇反射出或具體表現

出那箇新興階級的要求與希望的新的『思想』便必然漸漸發生了。那種思想也因宣傳與行賄的持久成了更有力的，直到他與舊的思想——那從地主階級發生的思想——衝突的時候。那最後死者的血充滿了歐洲的鬭爭的結果就是歷史家所稱的『宗教改良』(Reformation)。

擴大商業的範圍乃是這箇新興階級的經濟目的。如果牠們受那除僧侶外沒有人被允許說明的教條所限制了，那麼，這樣的教條是不得不被廢棄的。要廢棄這些教條，毀壞教會所占有的特權乃是首先必要的。教會是在聖經上的唯一的權威。牠獨占了解釋之權，那箇權一定要被廢止的。宗教改良運動是從教會與國家間的，國家與市民間的，國家與農民間的鬭爭——這些是起於封建的苛稅及城市的商人對於這些苛稅的反抗——產生的。宗教改良發生的時候不是亨利(Henry)第八時代。這箇運動，如果我們完全確定是一箇牠的確實的起原，乃是起於普蘭塔基萊特王

朝時代（註），那時國家貪取教會的財富以及牠的貪取被市民階級所擁護——因爲牠們在這兩箇階級的鬬爭中看見牠們的時機。在這箇時期中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着手翻譯聖經爲英文——因之英國人能夠自己研究牠了。

（註）普蘭塔基萊特（Plantagenet）是亨利第二之父所創英國王室中之一王，自一一五四年至一四八五年，即亨利第二至查理第三，均爲此王室中人物。

從這箇時期到『壯烈的革命』，資本主義，就是我們現在所稱呼牠的，經過了牠的英勇時代。一箇繼續不斷的鬬爭，雖然形式與時機變遷了，但是到底是同樣的。羅拉教（Lollardry），英格蘭教，清教，以及教派主義，到底意義還是同樣的東西——反對封建制度。牠們在一種意義中完全是不同的，因爲信仰的自由，那箇人解釋的自由，必然發生思想的龐雜。從來沒有這樣的一箇辯論和偏見的時期，但是每箇思想紊亂

的人都集中在一點上——打倒羅馬教，因爲天主教是在一箇痛恨的時期。

雖然豹能改變牠的斑點，但是牠沒有方法改變牠的天性。在基督新教的清教徒的英格蘭與蘇格蘭之中如像以前一樣的發生烙刑，伸肢拷問，夾姆指刑，溺殺，以及魔術的拷問，只是因完全不同的罪名。這箇新興階級有幾百年沒有脫離難關而且牠必要結合著。牠的革命的口號就是『自由』一語——科學研究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貿易的自由。欲爲本身獲得這些東西，牠不得自己集中起而且表示牠自己的倫理的與道德的思想於牠所剝削的下層人民的身上。用著一種和牠所推倒過的那一樣可恨的知識的專制，牠做了這箇。那新的道德，和老的一樣，是統治權力的道德。『自由』只是那些屬於統治者所有的。

通常所謂：道德，即人人自願遵一種行爲上的規則，是人與禽獸所

以相異之點。這是不對的。又所謂，禽獸只有利己主義，也是不對的。道德的最初根源，正在於人是禽獸出身，禽獸之中的羣生動物之一，所以人類從自己『獸祖』遺傳得來一種社會本能；這種社會本能是各種羣生動物都有的。社會本能的項點，就是肯爲著自己團體犧牲自己箇人。譬如野鹿的領袖便有這種本能，這是生存競爭中鍛練出來的；他如母獸能愛護自己的子女等，也是如此。原始人的種族和自己的仇敵常常打仗，他們往往表現一種肯犧牲自己的『愛種主義』，絕對不怕死的『英雄主義』，——這便是最早的社會本能。

人類文化發展之後，道德日益受經濟及生活的支配，最終結算起來，自然是受生產力狀態的支配。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C. Meilly: Puritanism.

第五章　歷史與宗教

基督教可以『決定』某種歷史戰爭的『形態』。凡是有點歷史知識的人不會否認這箇的。但是卻有一位斯特柴(Strachey)對於基督教的主張較之這箇太懸殊了：他認爲基督教變更了歐洲經濟制度的形式。他寫道：

沒有甚麼事情是更難於決定的，例如是因爲古代羅馬人容許了奴隸制度，便不能發明機器，還是因爲不會發明機器，便容許了奴隸制度。然而一般自命不凡的人必然堅決的相信後一的說法。但是前者卻能夠被證明是一箇怎樣適當的主張呵！

希臘人和羅馬人具有全部工業革命所必需的科學知識。我們知道哲學家希羅，已經發現過蒸氣機的原理。亞基默德(Archimedes)，

歐基里德(Euclid)，畢莎哥拉斯(Pythagoras)早使數學進步到了可以幫助機械的發展的程度。羅馬帝國有可爲廣大的工業的發展的充分的資本的累積。但是不知爲什麼這種事情不曾發生。那種結論，以爲在無量數的奴隸——那使支配階級無需金屬機器的人體機器(human machines)——的存在之一事中找得出說明的，是難以反駁的。所以機器時代要等過將近二十世紀之久，直到十八世紀中人類再有了科學知識和累積的資本兩者的時候，這一次機器的生產與我們在其中掙扎著的一切巨大的成效就一齊發生了。

在那經過的時期中改變過了的一箇因素是什麼？我們只能答復在歐洲十八世紀社會與羅馬帝國的社會間的最大的差異，就是在這兩者的期間奴隸制度已經消滅了。然而奴隸制度的消滅是因爲基督教的征服世界，無論一箇人怎樣的不願意承認這箇，這箇事實總是

具在的。

所以，由這箇推論，則使工業革命發生的不是一箇物質環境中的改變，而是人性中的改變——一切人類具最高而相等的價值的基督教的學說的結果。

企圖使這樣的一箇論調具體化眞正要是一箇勇敢的歷史學者才行。眞的，基督教實致奴隸制度的消滅！將近基督死後的六世紀，教主自己，即羅馬大帝，是常常到那督基教國的京城——羅馬——的奴隸市場中的。在伊利沙伯時代，英國大部分的收入是來自船長約翰霍士金及其屬員——他們的艦隊的旗艦名爲『耶穌』——的掠奪奴隸的遠征。教友派的教徒惠特爾（Whittier）不曾承認。

『他們吩咐那奴隸的船隻急行於各海岸，

用聖靈的翅膀煽動著』麼？

在那廢止奴隸運動的時候，梭多爾巴克爾(Theodore Parker)估計有八萬奴隸爲長老派教徒所有，有二十二萬五千奴隸爲浸禮會教徒所有，有二十五萬奴隸爲美以美派教徒所有，同時威爾伯佛士自己承認道：

『美國美以美派監督教會沒有發生反對這種主要的罪惡的言論。』

在奴隸制度的消滅之前的數百年，趨向自由的每一步未必不是正對著基督教會——統治者的一箇屏藩——牠的利益的一箇響應和牠的權力的一箇反映——的無情的反對才獲得的麼？一定的，基督教幫助了廢止奴隸制度，可是是在那已經說過了的一箇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在牠的殘害驅逐了法蘭西的和法蘭德斯的新教派的那些織布工匠逃往英國時，那種事無疑的對於這箇國家的後來的經濟的發展有某種影響。然則宗教改革是因爲基督教『改變了人性』呢？還是因爲更迭著的生產方法而致的

商業階級的產生和如是而發生的新思想的衝突的必然的結果呢？關於這一點、歷史是顯示得十分明顯的、

那末，如果基督教會默認過古代的奴隸制度——牠實行做了一箇巨大的奴隸所有者自然默認了的——爲什麼成爲文明的經濟的主要部分的奴隸動產制度（Chattel-slavery）結果漸歸消滅呢？簡單而唯一地因爲『生產力方法的改變』和商業的發生。商業沒有和舊時帝國的沒落同時停止。從迦太基的三層槳船掃蕩地中海時代直到現在，海運業是繼續不斷的，首先，奴隸動產制度就如一種基礎不得不在封建制度發生以前消滅了。基督教沒有發明封建制度，牠只是幫助了牠結構成牠的政治組織。密里（Meilly）在他的關於『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著名的著作中具體而充分的指出了封建制度的起源：

『生產力的增加，是與更自由的社會組織之保證工人的一箇絕

對更大和更可靠的部分的勞動成品，成正比例，這是一箇經濟的準則。換言之，卽更自由的社會形態有促進生產的直接效力。所以，當成爲動產的奴隸的耕作那樣浪費的和效率低的方法，在時間的過程中，開墾盡了歐洲的南部的土地的時候，又必需開墾北部較貧瘠的地方的時候，必然發生的是奴隸制度必要降服於一箇更自由些的一箇組織的『形態』。

『換言之，人類幷非馬上變成基督式的——牠已經是饑餓的了，是對著一箇經濟問題。封建制度解決了這箇問題。奴隸們變成了僱傭與自由農民。』

根據上面所說的，對那些物質的要素，在數百年中起著作用而使機器時代成爲可能的。應與以相當的考慮。這些運動就是沙拉森王國的產生，漢薩城，克魯沙斯及羅馬共和國的發生。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了

印度的新貿易航線的發現，和美洲的發現，這兩者給生產一箇極大的推動力，同時這兩者的起源是因爲土耳其的侵入歐洲，斷絕了東方商人隊的路線。沙拉森的織布匠之教導了意大利勞動者；就如英國的織布匠之被法蘭德斯的勞動者所教導——在這箇經濟發展很困難的過程中差不多每步都是在敵對著有機化的『基督教』。人類的『最高和平等的價值』在過去不爲基督教的勝利者所尊重，尤如在現在之不爲基督教的侵略者所重視一樣。基督教的美國的奴隸動產制度，不久以前才廢止而不成爲一種制度的——不是因爲任何『人心的變化』，而是簡單的因爲經濟的發展（例如，『機器時代』之到來）生出了那奴隸勞動成爲一種經濟的不合時代性的力量。美國奴隸制度的消滅可推出是由純粹物質的原因，這種物質的原因，在一世紀的短時期中，就成就了那基督教經過了十八世紀還做不出的，在美國謀利之徒中的精神革命。

郭力夫說得好：『宗教的力量就在於此：——人對於不可解的惡意的自然力和社會力發生很大的恐怖，同時又在渴望正義的伸張；因此宗教對於人類中之大多數，便有極大的思想上感情上的威權，統治者正可以利用這種宗教的威權，他們看著宗教是一種梏桎，可以幫助他們束縛平民羣衆於恐怖與馴服之中的。許多有學問的人，自己已不相信天神或上帝，但是往往認爲民衆是必需有這種信仰的：對於反對治者階級的行動，對於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的罪惡，雖然已經有很多的人世的懲罰方法，但是宗教還要添上陰間的懲罰方法呢。當然，宗教對於馴服而勤苦的奴隸，也答應他們死後的賞賜』。

宗教看見世界上有一種人是『治人者』，別一種是『治於人者』；富而强者如果發怒，那就貧而弱者只能哀求懇請祈禱以求赦免，甚至於非貢獻禮物不可。人間的現象既然是如此，宗教便設想天上也是如此，

如果人受著了災禍，人的能力不能防止不能抵禦，那麼，他就以爲天神發怒了，於是要祈禱他祭他。然而俗話說得好：『天高皇帝遠』。既然很不容易走到萬能的殘暴的老爺跟前去，那就只好去『走走門路』，哀求這老爺的僕隸，送些賄賂；對於天神也是如此：既然不能直接去請求天請求天神，就只好去求他的左右丞相，古聖先賢，神明的僕御，如儒牧或神甫之類。

然而歷史也曾有過一種時機——這一種宗教的工具，到了被壓迫者的手裏，那就彷彿一根棒兩頭打，打著了治者自己；那時宗教在平民手裏，和戈矛竿鋤一樣，拿起來打毀治者方面的特權。中世紀及近世史開始時的種種宗教戰爭，都是這樣的。

可是雖然如此，宗教始終是平的鴉片。牠對於歷史有過決定某種歷史戰爭的形態，但是牠於人類的大多數不是有利的。到了現代社會史是

明顯的，成了帝國主義者用以馴服殖民地人民的工具——先鋒隊。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Meilly: Puritanism.

第六章　思想之來源

從前有人發生過這樣的問題：『生存競爭怎樣能夠完成所謂進步的任何事物，假定原來不曾有一種『變化』使牠能因之而起作用？』

實際上，這箇問題是不待答復而自明的。這是與問如果沒有把水灌進去的瓶子，怎樣能灌水到一箇瓶中是同等的。必然要有一種變化（或者幾種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動物對之沒有任何支配力的生活條件的產物。對於人類的思想也是如此。那種特別的變化，使『人性』之船由猿類之中航行出來的乃是一箇大些的而且是更可教育些的腦筋。那箇腦筋因其大些的可能性，由生存競爭而發達了。此中就藏著加多了的知識的可能性，就是說，智能的尖銳化。現在我們要轉問：那些智能怎樣尖銳化了的？那智慧爲什麼增加了的？知識爲什麼累積起來了的？答案是

同樣的——因爲生存競爭，或者可以正當地稱爲初期的『經濟條件』。

在一箇差不多無毛的生物與一箇敵對的環境——一箇充滿自然界的仇敵與不可知的危險的世界——相鬭爭的時候，同時被强迫而不顧巨大的困難從那箇世界攫取牠的每日的食物的時候，牠是慮著福禍的降臨的。如果那箇生物缺乏馬與鳥的速力，缺乏肉食禽獸的爪牙，缺乏哺乳動物特有的溫暖的外衣，缺乏猬與龜的天然的保護器，或者大毒蛇與響尾蛇的兇猛而巧妙的武器，牠會慮著早死的。這樣的一箇生物就是古代的人，然而他還是生存了——生存到差不多征服這世界。在那可怕的鬭爭中他的武器就是他的奇怪的頭腦，這箇頭腦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而是生存競爭在他還沒有成爲一箇人以前爲他造成的。有兩句老話是許多玄學家所常用的，可是他們並不相信的。這兩句話是值得在這裏舉出的：『自衛是第一箇自然法則』及『需要是發明之母』。所以，人『找出了許

多發明』，因爲自然在各方面除頭腦外對於他是吝嗇的。他由發明了箭而得著鳥的速度；他以削制名角石，打火石及黑曜石成爲打獵的武器而具備如獸的爪牙；他發明衣服而戰勝惡劣的天氣。他發明這些東西，不是因爲他是一箇玄學論者，而是因爲，如果他要在鬭爭中生存，他便不得不去發明。每次發明都是一種思想上的結果。但是思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那是從生活的條件得來的。在原始人類飢餓利寒冷的時候，同時岩洞的野獸時常侵入他的洞或他的山岩的棲身處使他受滅亡的恐懼的時候，他非常快地得著一種思想。

我們的偉大的思想的搆客之一就是哲斯脫登先生(Chesterton)，他說，撇開一切的理論，一箇動物從沒有著作一本哈姆雷特(Hamlet)或一本仲夏夜夢(Midsummer Night's Dream)（兩者均係莎士比亞的名劇）的事實便是證明人是動物界的特殊生物。是的麼？由這種同樣的推論，一箇

蜜蜂可以巧辯說一箇章魚或一箇蚜蟲，因為他從沒有製過蜜，便是屬於動物界的特殊的生物。古代人類的頭腦所學得的第一箇大課程就是團體是有力的。遊牧人羣，氏族，酋長部落，等等在自然的意義中都是與狼羣羊羣有別的，初民必然依靠聲音與手勢以為一種交換意思的方法。當他初期的未成熟的社會組織發展了的時候，有音節的文字也就發達了。語言與文字都是社會的產物。由發達語言與文字，人就成了一箇抽象思想的思想者和別人的思想的集合者。抽象的思想就是一箇社會的產物。一箇動物從沒著過哈姆雷特或唐阿仙特（Tamo' Shanter 十八世紀英國詩人Burns所著），因為沒有動物能夠在紙上寫出牠底思想的抽象的思想者。如果人從不發達思想的工具——那箇社會的產物．有音節的語言——他決不能產出哈姆雷特。任何人能夠否認有音節的語言由於聲音的表情——那在危險未威脅的時候幫助了接合初期的社會組織的淺薄的摹仿的

音調——發生的麼？語言的產生就如那火石斧——對於一箇特別可教育的頭腦而發生必要而產生的。

我們暫時放下最初的人類，而來專一的討論近代的一些有力的思想。研究和編錄天空中的星宿乃是某一方面的一箇大的思想。而水力學的發生也是可注意的事情。我們從近代的人類學者來研究，同時研究那介紹這一切尤其是介紹到社會的經濟中的夢想者是誰，以及他爲什麼夢想。我要概括的寫出卡里教授(Professor Cherry)的發見，茲將他的意見概略的述之如下：

文明是在尼羅河流域(Nile Valley)開始的。牠不是因爲幾箇唯心論者認爲文明必是一箇好東西而開始的。在許多世紀以後，當尼羅河——人們食物的供給依賴著牠的氾濫的——把灌漑的知識告訴了古代的埃及人的時候，文明就開始了。一旦學習過這種知識就對於生產給了一箇推動

力。天文學的分析研究，使由這箇『生產方法中的變遷』發生了。天文學不是被詩人所研究出來的，而是被那發見天空的方位與河水的氾濫之間的暗合的經濟學家所研究出來的。由研究天空現象，他們便能夠預先知道尼羅河氾濫的時期同時先期預備灌漑的工作。由這箇事實，他們發現了陰曆年和陽曆年。他們更實際地把一年造成三百六十五日。所以曆書是爲經濟的目的而發明的。廣大土地區域的灌漑使幾何學，測量法等等的研究，以及水力學一箇極複雜的系統發生必要。這一切的事物都被完成了，又從這一切的事物生出一箇新的宗教，一箇新的政治上層建築物（牠在陽曆年代替了陰曆年時也就改變了）及一箇新的政治組織。我無須再事推考了。近代埃及學的發見說明了那些在文明的起源中結晶出來的思想的本身，是起於古代埃及國中的發達的人口的尋求食物的必要和在那食物的生產中的更迭的方法。

尼羅河流域的農業組織顯示了文明的起源。在社會的關係被那些曾經發生過的最巨大的革命之一所轉變了的時候，農業的組織就是人類的歷史中的特點。那到現在還是部落性質的私有制度成了新經濟制度的基礎。由這箇私有制度不僅產生了前文所述的文化的原素，而且經過巨大集體的生產及其系統——紀律——的組織的必要，發生了奴隸，王朝政治，僧侶政治，以及專制政治等制度。這後面的三者乃是爲那第一箇名稱——奴隸制度——的保存的必然的國家工具。從奴隸制度——那成爲至少有正相反的利害的兩部分的人類組織的劃分——的萌芽時起，那些得薪俸的知識服務者（從前時是那些僧侶，卜士，醫藥家，女巫之類）的作用就是去對那些奴隸講一種道德，倫理，或是宗教，那是佈置好了去勉勸他們儘可能的和平地與那些主人分享他們所生產出來的盈餘的。

古代先覺者的呼聲乃是反抗經濟的不平等的眞正的表現。他們的呼

聲，從埃及的摩西的呼聲至巴力斯坦基督的呼聲更至凱爾哈地（Keir Hardie）的呼聲，都是革命的呼聲，但是君士坦丁的僧侶，即羅馬王，就如大衞德（David）統治時代狡猾的僧侶之有意曲解這種現成爲一箇猶太僧侶制度的謬誤的形式一樣，他們在經濟環境壓迫之下，曲解耶穌的福音成爲那不是『解放這些俘虜』而是幫助密結他的束縛更牢實加於他的身上的巨大欺騙。在尼采譏誚基督教爲一種『奴隸的道德』的時候，他同時是十分正確和十分錯誤的。基督教國的有力的教會所傳佈和施行的基督教是把人弄成奴隸。那創立者及其直接繼承者所傳佈的基督教乃是對羅馬經濟制度的腐化和暴行的一箇抗議。那箇基督教被槍刀和柴火，十字軍和圓形劇場，所殘害了；另一種基督教被統治者所擁護和崇拜的，他們『裝飾了那正義的墳墓』，同時他們都是『那些殘殺先覺者的孩子』。不管一箇人怎樣看法，他總逃不了那樣死板的事實，就是那

兩種樣子的基督教只能用那根據於少數人統治的經濟制度的不妥適而生的利益衝突（那不鬆懈的戰備）的眼光看才能適當的了解。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Meilly: Puritanism.

第七章 從美國內戰來觀察

與奴解解放有密切關係之美國內戰供給了學者以歷史發展中的要素的一箇開明的課程。關於這箇突然的慘劇的一般的觀念大半被小說家英雄崇拜者越出事實的線索所加上的感情的渲染所惑亂了。這箇，乃至一般的歷史運動的，公認的觀念，曾經有過下列的十分恰當的議論。其中認爲基督教乃是美國眞正奴隸制度的解放者，由下列的一段來看，表現是『英雄的』或利他主義的：

『我們要相信在南方急劇的爲奴隸的廢止而戰爭的時候，由發財的觀點看來他們是很愚蠢的。我們常常知道那些種植家明瞭奴隸耕種和採取棉花爲他們生產了大量的財富。世界上有什麼機器和這有關係呢？在林肯看見一箇奴隸女子被拍賣的時候，傳聞他曾說：

「如果我有機會，我要努力打倒這箇事件」。我們了解他是被一種發源於基督教的對那不幸的犧牲品的高尙的憐惜心所激動的。我們不能相信他是想著那他正在發明以代奴隸勞動的機器。教會當局對於奴隸制度問題的無情也不能猛烈的攻擊，同時是現在難得了解的，但是說威爾伯福斯(Wilberforce)約翰布郎(John Brown)和斯陶(H. B. Stowe)不受純粹基督式的精神的影響，同時說受他們領導的那些人只是受經濟的影響，簡直是不眞實的。在各箇時代中常常有英雄人物，他們都，甚至畢生，爲人類的幸福而走險，而且使成千成萬的人受他們的指揮。我敢說經濟利機器至少沒有影響他們，如果阿拉伯人發見帆船比較用奴隸的划船有用些，他們也未必全然放棄奴隸制度。

「我無須詳細的討論這箇明顯的論點——那擁護奴隸制度或工

貧奴隸制度的卑鄙的精神不是受機器或經濟的影響。牠有時受心理的轉變所影響罷。若是一箇熱心研究的歷史學者不能看出來時時有利他主義的高潮，洗去了若干世紀的罪惡的，那眞是一箇奇怪的智力了。—

我們在這時要能夠認識那存在於許多人的心理中的可怕的混亂的觀念，在其中上面的一番議論乃是一箇勇敢的表示。初等教育的學校和庸俗的作家：自然都是這些全然荒謬的思想的發祥地。南方反對廢止奴隸，而北方卻主張廢止。利他主義與這次事件有什麼關係呢？我們會相信北方的基督教徒曾以某種神祕的力量變成利他主義的專利的占有者麼？再簡單的說，爲什麼一切利他主義都是在那稱爲北方的地域範圍中呢？對於這箇問題，讓我更精密些的研究這箇利他主義。麥萊(H.A.Murray)艦長在合衆國與加拿大的遊歷之後，於一八五五年，內戰前九年，曾經

說了下列一段話：

『我對於這箇問題首先要問：北方的宗教狂熱者——奴隸廢止的十字軍——的吶喊的意義是什麼？口頭上，那是奴隸的自由；實際上，卻是他們的鄰人的掠奪。如果這箇建議起於那些將居宅背在肩背上的阿拉伯人，我必然可以了解這箇適當的建議；但是如果起於那些對於貿易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人，以及他們對於一切金錢問題的銳敏如果較之以列色人中的最精明的以列色人只是同等的而不是更有利害些的人，那麼，我自認那箇問題是超過我的管見蠡測了的。要是那有一種足以配得上那所說的犧牲的金錢的貢獻，我還可以等得到；但是對於那些人或是他們的後人，他們知道了白種勞動更有利些的時候，就將他們的黑色的同胞賣給他們的南方鄰人，就這樣很容易很獲利的從他們的地界內剷除了奴隸制度；對於那些人

，我說是，回轉頭來以傲慢的勸世文，用自以爲是的腔調，講著解放黑奴的十字軍的，實是擺着一種無與比倫的老臉皮』。

麥萊艦長不斷的痛斥奴隸制度，他表示很顯明地認識北方利他主義的獲利的基礎。這裏還要提出另一的問題，爲什麼北方人發見白色人的勞動更有利些？反之，爲什麼南方人如是堅持的爲保守這箇制度而戰爭？我們先來討論那純粹戰爭的淺薄的意見。假定那些上流的重要人物，如美國之林肯，格利遜，約翰布郞，斯陶，都被那黑奴制度慘劇所戰敗了。他們決心戰鬪，而且在許多年的不屈不撓的宣傳的努力，同時以箇人的力量與自身的犧牲，他們最後使成千成萬的人信仰他們，他們在打倒私有奴隸的人民中獲得了勝利，同時奴隸制度果不再存在了。因此一箇『數百年的錯誤』，由少數心地高尙的人的熱誠所喚起的一箇『利他主義的高潮』，差不多馬上就被撲滅了。

這箇解釋看起來十分漂亮的，同時讀起來很有吸引力的。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那一囘事。還有許多偉大而心地高尙的美國人，他們曾經在林肯時代之前反對過奴隸的販賣，但是沒有發生過內戰——因爲時間沒有成熟。在一八五〇至六〇年代的時期才成熟了。什麼東西使時期成熟了呢？

在這裏我要向讀者引出著名的美國歷史家達越普博士(John W. Draper)所寫的一段有價值的文字。這是在他的名著Conflict的序文中可以找着的：

『歷史的組成有兩箇方法，卽藝術的與科學的。前者暗示着人爲事件的原動者；所以牠選擇某箇傑出的人，在一箇想像的形式之下描畫他，把他作爲故事中的英雄。後者，必使人類的事件呈現着一箇未解放的束縛；在其中某一事件乃是某一過去事的苗裔，同時

是某件後起的事件的根源，這就是說人不能支配着事件，而是事件支配着人』。

左列一段文字中的最堪注意的事實是這箇：達越普差不多每句話是由林肯的講演詞引出的。

煽動着這一時期中男女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那種我們稱爲『觀念』的——乃是奴隸廢止運動。現在沒有人要反駁這箇事實，就是林肯由偉大的歷史戲劇中成了牠的最大的角色。他的態度，人格，特性，不管你怎樣說，是自始至終支配着這箇舞臺的。他的名字在歷史上勝過一切別的人。但是林肯從不是一箇奴隸廢止主義者，也從不贊成干涉奴隸制度。他是一箇有智力的，富於策略的，精明的，而慈悲的政治家，但是他對於黑奴並不大關心，他完全是反對奴隸制度，但是從不曾承認黑種人對白種人有何社會的政治的平等的權力，他自始至終是反對這種意

見的。他再三的宣佈（見他的演說）他並不贊成干涉奴隸制度，『在其所存在的地方』。他相信這箇制度最後會消滅的。這次戰爭强迫他發表解放宣言作爲戰略的先着，如是而已矣。他好幾次拒絕發表這箇宣言——有時覺得他像發表一道『羅馬教王反對彗星的勅令』一樣。林肯在他答覆格里萊——他在他的報紙 Tribune 中表示要求解放奴隸——的信中說道：

『如果有那樣的人，他們不能同時消滅奴隸制度的時候，不肯保全合衆國，我是不能贊成他們的。我在這次戰爭的無上的目的是保全合衆國，既不是要保全又不是消滅奴隸制度。如果我能夠保全合衆國而不解放任何奴隸，我會這樣做的』。

他在Cooper Institute 演說中痛斥約翰布郎在Harper's Ferry 的行動而且把他比爲一箇瘋狂的熱心者——一箇好像歐耳西里 (Orsini) 一樣的暗

殺者，他所引用的『猛烈攻擊奴隸制度』的話，極端的虛僞。奴隸的虐待使他憂鬱，而非忿怒。他相信奴隸制度是他畢生的不可避免的罪惡，而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期他從沒有一箇反對奴隸制度的堅定的主張。這些事實會使人驚奇，但是卻是眞實的。林肯是一箇慈悲的人，一箇人性中少有的人物，但是就那由宗教的思想鼓舞着他的行動來說，他卻是一箇無神論者而且是一本反宗教的書的著作者。

人們爲自由，平等和博愛而戰爭，他們始終卻是實際地想着步兵，騎兵，和礮兵。所以在人道主義——實際上不能成立——的空氣中，這次內戰被政治家製造出來了，而這次政治家不是想着奴隸，而是想着土地財產，棉花利潤，或者如林肯所說的一箇國家的政治與地域的統一。我們再推舉一位學者，來說明這箇實事。斯特魯斯基 (R.Strunsky) 像這樣簡單的說明當時的情形：

從奴隸的觀點來說，奴隸制度與美國的內戰的關係極少。北方並不歡迎那被解放的黑奴爲自由勞動的競爭者，也不歡迎他們爲白種鄰人中的同樣的土地所有者。故奴隸制度被小地主所反對，卻只是因爲他們反對大地主。實際上，非熟練的工人也反對奴隸制度，因爲他降低了他們的勞動價値而且妨礙了他們的雇傭，但是非熟練的工人在一八五〇至六〇年代中自己很順利的變成了小地主。他不是一箇『適合於那箇生活條件中』的勞動者——這是林肯的話。在那城市中工作的而且『適合於那箇生活條件』的練熟的工人沒有方法接觸這箇問題，縱使接觸也是敵對着廢止運動的。他們說：『我們也是奴隸，我們無暇顧及別人的自由』。在大地主與小地主之間的勢力的行列之外，還有那期望稅率增高的西方的商人和那已經是自由貿易者的南方的耕種家之間的敵對。但是更劇烈些的分化卻在

西方，而且是對抗着那將要開闢的新領地的統治。於是，那在他們與南方奴隸勢力的鬬爭中鼓舞着美國人的是財產，而非自由。這段話是十分爽直的。那與黑奴人無關係的白人間的經濟衝突的概略的描寫是值得注意的。這位著者在另一段中更用力的說着，同時把一種機器——火車頭——介紹於我們：

「並不是由於在鎖鍊中的三百萬黑奴，也不是由於在鞭策地位的地主們的慘刑，也不由於那些帶着獵犬在冰塊上奔走的活動者的思想，使那些無奴隸使用的白種人那樣決心的反對那種制度，乃是由於奴隸制度代表大規模耕種，而大規模耕種會使小地主失丟土地的那種實事。卽使在那時南方的大地主仍可和平地向西南方發展，而小地主向東北方，要不是鐵路的突興使邊境接近了文明，使人民起了那大小的財產所有者會最先闖進那新開闢的理想黃金國，將牠

收爲自己的的問題」。

實際的意義上，一箇理想上的黃金國是一箇能攫取金錢的地方。鐵路使這樣的地方逼近些；還有那被奴隸制度加强了的大地主與小地主之間的敵對。

就算奴隸制度不會發生多數奴隸所有者的攫取土地與小地主的消滅的危險，此外還有什麼東西劃分了北方與南方呢？英國的產業革命美國已經有了牠的反射現象。當蘭開夏的紡織工業由於哈格力夫思，克倫卜吞，阿克萊特，等等之機器的發明，已經發展到極盛的狀況的時候，棉花的需要是非常劇烈的。棉花來自美國，而且那依賴於來自美國的原料的產業的促進就必然要以促進那種原料的生產來反應着的。所以美國的聰明人，在蘭開夏向他們表示了那增大了的需要問題的時候，便獲得了這箇必然的思想。這種美國人的思想就是英國人的『生產方法中的變遷

」的結果。那麼，我們讀到左列的一段文字的時候，我們就不會表現什麼驚奇了：

『在一八四〇年，一箇新的南方與一箇新的北方產生了。紡織機器的可驚的發明與進步的運輸已經把南方變爲一箇統一體。雖然耕地向海灣諸州轉移，但是潮水的諸州成了他們的奴隸飼養地，一種根於互利的堅決的團結精神就在這箇區域中發生了。所謂「棉花王國」就與起了，牠，警覺的，自覺的，不再爲牠的「奇怪制度」而抱歉，卻在經濟上，政治上，道德上……認之爲合理。奴隸所有者不到南方人口六分之一以上，但是他們知道統治的技術，而順利的統治着他們的地域。在北方的社會漸漸到了以男子的選舉權與自由的耕地爲基礎的時候，南方的選舉權只是擴張到奴隸所有者的範圍，而立法的權力僅僅給與那些海邊的原有的貴族。……北方的鐵

路一再的交叉如網地鋪張着，形成一箇從大湖擴張到阿亥阿(Ohio)而且伸到大西洋邊的網狀物。在一千八百六十年時，鐵路看來很像一箇蜘蛛網。……在他們急劇的發展土地的時候，他們繼續不斷地向前推進邊界。北方的發展意思是土地與公民，而南方卻是土地與奴隸了』。

我們再從這位作者引出下列的一段文字來，以爲讀者便利了解『密蘇里的和議』(Missouri Compromise)的起原：

『南方的耕地制度已經從潮水的地方擴大到高原。那無奴隸所有權的白人被迫而到荒蕪的沙山和南方的松林區域，或者出於自救的，迫而移往印第安納及伊里諾斯的無限制的土地。容許奴隸制度越過米西西比河就是容許牠去奪丟他們的對於那種土地的權利，那種土地在他們本來不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以及印第安人的名義的限制

的。但是因爲那種特著的美國人的憲法的心理，他們就想出了一種辦法，那種辦法，與一切辦法一樣，又因爲他還見不到未來之事，總必須似乎是想得很好的。他對有奴隸的人們說：「我們可以劃一箇界限，界限以下是可以有奴隸的地方，界限以上必須沒有」』。這箇界限在六十度三十分，就是一八二〇年的密蘇里和議，那得以緩和了兩箇敵對的經濟勢力——大地主與小地主——之間的衝突的和議。

至於人性大部分怎樣在這箇問題上起作用，林肯自己不是不了解。一箇有力的而明白的解釋，是在一八六〇年他在與達格拉斯的辯論中所用的一段：

『譬如，我們假定羅思博士有一箇奴隸叫做希姆波，那問題就是：「希姆波仍然做一箇奴隸，或是被解放出來是不是上帝的意志

—？萬能的上帝對於這箇問題沒有作過可聽可見的答覆，他的啟示，那聖經，也沒有作過答覆——或者至多不過那種使人對其意義發生爭論的；沒有人想到問希姆波對於這箇問題的意見。所以最後就到了這種情形，就該羅思博士決定這箇問題了；而他想的時候，他坐在樹蔭之下，帶著手套，依賴著希姆波在烈日之下勞動而得來的麪包而生存。如果他決定——上帝要希姆波繼續為奴隸，他保持了他自己的安樂的生活；但是如果他決定上帝要希姆波被解放，他就不得不走出樹蔭，脫去手套，而且要為他自己的食物而工作。羅思博士會被那公認為最合於正當解決的完全不自私心所激動麼』？

我們無須更多的討論，這些敵對的既得的利益——這些利益在林肯，加里遜，斯陶，和布郎出世以前就已發生了，而且被那於一八二〇年的『密蘇里航線』的和議所緩和了——在這裏已經充分的表現了那引起

了叫做內戰的變亂的事實。那次變亂羈絆着大人物如林肯者在牠的支配中，同時指揮他們的行動就如牠指揮南方同等的大人物的行動一樣。勞伯特李(Robert E. Lee)是和格遠特(S. Grant)一樣勇敢而豪俠的人。他們每箇都是爲他們所信仰的一種理想而戰爭，然而，他們都同樣是錯誤了的，就如那爲『片紙』(Scrap of Paper)(註)的光榮而英勇的戰死了的克契涅(Kitchener)的軍隊的青年也是錯誤了的一樣。北方的理想是『消滅奴隸制度』。南方青年士兵的理想卻是『國家權力』。他們說：『我們也不相信奴隸制度，但是我們相信國家權力』。但是這兩者都是無意義的。在這次戰爭之後，黑種人飢困於工業的屑渣堆上，同時詛呪著他們被解放的日子。甚至今天，美國的黑人是那樣的『自由』，使得他們不敢走到白人的教堂裏去崇拜白人的上帝，也不敢乘白人的電車，有些地方也不敢在白人的步行道路中行走。如果他們目無法紀的在運動場

中與白人競爭，警察就把那『上帝自己的國家』，『甜美的自由之鄉』的白種孩兒們的袋中六響手槍打空。唉！我們無論如何且拋棄那些騙人的話。懂得眞理就是更加懂得我們自己。眞理不會減少我們對忠誠的人類的企圖的仰慕。牠不會減少實際的精神的崇高的偉大，也不會消滅我們對於美麗而偉大的精神，如像林肯的的敬愛。林肯高出他同時人之上，正如巨人在小人之上。自然，他創造了歷史，因爲歷史根本就是人所造成的，可是他創造了歷史只由於環境所驅使。若是他不生在美國奴隸動產制度時，也就會無所聞名了。我們且看他自己如何說：

『我不敢說支配了事情，卻要坦白的承認是事情支配了我。現在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家的情形並不是那一黨或那一箇人所指揮的或希望的。只有上帝敢說。假使上帝要消除一箇大的錯誤，要我們北方人和你們南方人在那箇錯誤中共同的合作起來，歷史會由此

發現新的原因去證實上帝的公正』。

林肯所稱爲『上帝』的，我們已經對歷史破除了迷信的人稱之爲由社會發展所引動的各種力。林肯用了『上帝』或『萬能的上帝』正如我們用『命運』那樣的字一般。

我們對於美國內戰與奴隸制度問題的結論，最好莫過引用孫普爾女士（Ellen C.Semple）之名著美國史及其地理上的狀況，及地理環境的影響兩書所說的。她在前一本書中說道：

『美國的奴隸制度問題原來是一箇氣候與地質的問題——一箇富饒的灌溉的河流與肥沃的海岸平原——同著一箇溫暖的，有雨水的，變化無常的氣候，對於那山嶺崎嶇的高原，與結冰的草原或海岸，同著一箇更寒冷的更惡劣的，而更使人興奮的天氣問題。制度的道德如像「派權」，是一箇久已討論著的問題，這箇問題一直持續

到新英格蘭發現了那對於他的滲着石子的土壤的奴隸工業的經濟的不適宜，而爲打倒這箇制度的領導的時候。

在南方也有這種同樣的地理條件，只是有利於耕作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唯一的是把奴隸的勞動變成有用的，所以南方的人在經濟和道德二者的立場上都擁護著這箇制度。

這是對的！但是還有更正確的，這位著作者說明了由於南部與北部間的關係的困難——那地理的條件所造成的困難——更進一步的顯示了分離的原因。玆引用她的浩繁的注釋的一節，這一節是她引自雪拉爾的肯塔克史(Shaler's History of Kentucky)的：

『在土壤肥沃的石灰岩層中的居民大多數是極端的擁護奴隸制度，然而那些居在比較貧乏的沙石土壤的人都是反奴隸制度的。這種政治的地質上的劃分在南方是很普通的。』

膏腴的南方！沙地的北方！那大規模驅使奴隸的工作者！那必然的小規模的土地耕作者！其中一箇擴大，另一箇就有滅亡之虞。林肯就如像克倫威爾似的到來了！這正如乳汁之入於椰子中。

（註）歐戰開始，德軍侵入比利時，英國出而干涉，德相乃曰比利時中立保護條約不過一片紙，此語因是得名。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Fairgrieve: Geozraphy and world Power.

Semple: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zraphical Condition

Drapen: Conflict.

Semple: Influences Geozraphical Environment.

第八章 藝術之基礎

我們由前面諸頁中所呈獻的思想路線，獲得了對於人類社會的龐雜的歷史事業的一瞥，我們大約已經銷去了一些迷妄，而得到一些思想上的正確認識。歷史是人們現在只在學習探究的園地，而那眞正的探究者就知道沒有叢林是可以被參透和掘發牠的祕密，除非斧頭斫着那逆對著的叢林之根。許多的訴苦聲，從那些已經知道了他們所懷抱的幻想被那無情的邏輯之斧所攻擊的時候，達到我們這裏了。如果一切被摧毀的只是一種荒誕的見解，他們爲什麼要悲惜呢？在荒誕的廢物被踏入時代的垃圾桶中，而讓位於一箇解釋過去的和以希望鼓勵著我們現在努力的哲學的時候，爲什麼要失望呢？『你是要奪去人類的所有的尊嚴的原子』，有一句批評是這樣說的，『我寧可指示他是一箇人』，而不是什麼天

上的亞里斯托芬（雅典詩人）的傀儡。

無論如何不得把上面所寫的誤會成爲說人是一箇行動的機械。我們所謂歷史的研究是那些——否認一切進步之最大推動力是一箇物質的——人所不能從中得著眞理的一回事，並不是（如果我已經指出來的）將人類行爲的別種動機推於歷史的外面。親愛，慈悲，忿怒，猜忌，報復的或美感的愛好——一切的這些每常使人作違反物質的利益的行動。然而社會不是烏合之衆。歷史的進程不是停止在那箇人主義的那樣的不穩固的基礎之上。社會或者不是一箇有機體，但是牠不僅僅是一箇許多箇人的集合體。牠的分子可以對於世界上每件事情都是各走一方的。牠們可以分成意見極其分歧的無數的集團，如肉食者與素食者，種種宗教的與倫理的分派，著合理的衣服的熱心家，活體解剖論者與反活體解剖論者，禁酒主義者，節制飲酒主義者，和贊成飲酒者等等，至於無窮。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的思想互相分歧，或無論如何他們的皮色，種族，國家，部落，或氏族的不同，有一件事情都是一致的——他們都是一致於必要獲得一些東西放進他們的肚皮裏。『那』就是生活本身的，人類社會的與歷史發展的出發點。那是社會的無上的動力，縱使在那箇社會中有少數的高尙的箇人本質是那樣特異的，他們能夠超越而睥睨社會。

最先引起社會的組織的乃是這箇，而歷史的運動就是那以可能的最少努力而生活的人類的努力的故事。他們時常企圖以智識的靈巧避免艱苦的工作，同時發現與發明從他們的企圖中發生出來了。他們已經趨於支配自然的勢力，但是是不是能夠支配着他們自己，那是有疑問的。那是一定要到來的，但是要等到所有特權的那部分人的統治被顚覆了的時候。當這箇眞理愈爲大家所公認了的時候，那形而上學者就愈少，而了解歷史的眞理的人就愈多了。

像我已經說了的，感情的衝動並非一定起於經濟的目的或行動的人的物質利益；但是就是這樣，也不能逃出物質的法綱。的確，甚至藝術也受那同樣的牢不可破的法則的支配。天才是一箇問題，這箇問題的解決要在遺傳與心理學的領域中才能探究着的。實行然後才能健全，然而當我們討論藝術的時候，我們是討論人由實際的方法去表現事物的技能。當我討論到這表現的本身的時候，我們是探究那由物質的動力所直接決定的。在建築術中，建造寺院的埃及人不得不利用那他們的土地的地質構造所允許的方法。他們沒有用『盤塔里克斯』石來建築，因爲在埃及沒有『盤塔里克斯』石。他們沒有用他們的天然的沙石，石炭石，和花岡石建築脆弱的，優美的建築物，只是因爲在巨大的沙漠中是和這種優美建築物會像卡諾的寺院在梭奇霍爾街（Sauchichall Street）裏一樣的不倫不類。他們的寺院都是巨大而呆笨的建築物，其門前大路的兩傍

排列着那高聳於掩護着的牆之上的金字塔式的無數塔，這是想（從藝術的觀點）以他們的巨大的體積破除沙漠風景的單調。埃及的寺院，如像在伊德佛或在加勒克的，看來就像雅典的外城的項上的那引人注目的東西一樣。牠實有了巴林里監獄的形狀。然而，在其本身的地位中，牠表現是莊嚴的，令人起敬的，增加美感於那可怕的一望無涯的沙漠。

另一方面，在希臘中風景卻是被山脈，小山，及深谷所破壞了。到處都有海水打擾，還有那些無數的海島與孤立的礁石滿布着，總不會感着景色的單調。因這樣的天然的變化，希臘而非埃及無論如何在建築術上成爲技術中的主要的文明，至於氣候也是易於想像得到的。在埃及雨水極少，建築者對於天氣問題的計劃就沒有必要了。另一方面，希臘的寺院就是一定要有一箇接於正門的廻廊，而埃及的寺院卻常是沒有的。還有一箇明顯的差異就是圓柱的佈置方法。在埃及，圓柱都是在建築物

裏面。在希臘，這箇主要的裝飾品，圓柱(Doric式的，Ionic式的，或Corinthian式的)都是在外面。其原因純然是物質的；圓柱的裝飾的佈置是在於表現精神和引起觀衆的感應，就像有色的玻璃窗之在西方的大寺院一樣。在埃及進香者要到寺院裏拜神。在希臘，寺院完全不是爲集會的，牠是藏着神像的廟宇，朝拜者是對於廟宇舉行祈禱，所以最引起感情的建築物的形式是在外面。因此，在藝術與哲學的研究中希臘是在古代各國之上。這不是因爲他們的宗教是一箇比較純正些的，也不是因爲他們的上帝的觀念是一箇比較正確些的。卻是因爲他們有一箇有閒階級(Leisured Class)。每箇市民都能成爲藝術家和批評家，因爲除了思想和創造而外，他們無事可做——因爲他們一類的人都被那成千成萬的待遇如禽獸的奴隸的勞動所養活着。

「誰會想着

餓着肚皮的人還能唱歌呢」？

必須先要有了閒空工夫，然後才能玩那種藝術的創造力。如果氣候，地文，和地質的組成這些因素限制了希臘和埃及建築術上的形態，那使其能發展的就是奴隸動產制度的存在了。

我們如果研究野蠻人，半野蠻人，甚至於鄉村平民的簡單渾樸的創作。這些人的渾樸思想還沒有受着現代社會的影響而崩敗，眞是所謂「尙有三代的遺風」，那麼，我們可以看見他們的藝術裏，各自反應着自己的經濟風俗和生產方式。譬如漁獵時代的原人種族，我們的歌曲和舞蹈，總是扮演着打獵的情形，或者摹仿野蠻的舉動。最早的表顯藝術，例如原人的圖畫，現在還保留在獸骨或器皿上的，亦是反映着時人的生活和想像——大概都是畫着那些禽獸，就是當時人類生存競爭中最有關

係的動物。至於戰爭和刼奪爲生的原人種族，便有軍歌和軍舞，鼓勵勇氣，他們的圖畫亦是描繪戰爭的居多。總之，古代藝術，一如哲學，依賴於一箇穩固的物質基礎。

關於這箇問題有一篇有價値的論文，就是斯坦拉德(Harold Stannard在 Outlook 雜誌上所發表的。這篇論文是對於一位希克思 (Hinks) 關於在柏林呑別墅的佛藍得 (Flanders) 藝術展覽會的反對批評的批評。Van Egcks, Mabuses, Breughels。和 Van der Wegdens 諸佛藍得藝術家的作品在那裏展覽的是很多的，而希克思先生卻在 Outlook 雜誌上說對於這次展覽會『無所感觸』。佛藍得藝術的研究者以及他們過於細緻的研究，他們對時間上過於詳細的研究，明顯的是希克思所不取的。他對於他們的缺點以意大利的情形來批駁他們，意大利的畫家，在大的範圍與邪構成他們的作品的格律中，不注意甚至放棄瑣細的事件。直接了當的說，

希克思認爲這兩箇派別的巨大的差異歸因於形而上學。意大利人是受東方的影響，主要的是宗教的，佛藍得是比較唯物些。

術家，他那樣精細地分析繪畫兩派間的差異，是很卓越的。他說：

「希克思對於柏林呑別墅（英國皇家藝術院院址）的佛藍得藝術展覽會無所感觸……總括來說，希克思先生的論點是東方的藝術涉於形式與格律的實質，反之西方的藝術卻趨於敍事的寫實主義。……希克思自己陷於困惑之中了，因爲他以錯誤的方法來解釋這箇問題。藝術界的特性不是以交互作用的感應力的形而上學的研究所能說明的。這些特性是發生於那產生藝術的條件，而最後的方法，佛藍得的與意大利的藝術間的不同卻是因爲這箇事實，就是佛藍得人以裝飾彌撒書（Missal）爲始，而意大利人以畫牆壁爲始……牆壁

的繪畫必然趨於忽視瑣細的事件和發展一箇巨大的，有格律的圖畫的情緒。這些必然的趨向不是因爲易於感受東方的影響。而是因爲不得不塗遍大的面積，同時要在石灰未乾以前敏捷地塗遍著。事實上他們就達到藝術所由產生的條件。反之，彌撒書的繪畫必然趨於裝飾的意味，瑣細事件之推求。這些趨向不是因爲性情的平和，而是因爲一頁寫的字沒有別的什麼方法可以裝飾的。他們也得到了藝術所由產生的條件。是故，意大利的畫架的繪畫常是一箇縮小的牆壁，而佛藍得常是一頁寬大的書頁。就希克思正確的觀察，這種起源的不同影響到結構上。一箇意大利的圖畫總要想滿裝著材料，一箇比利時的圖畫卻要想將所有的材料裝進去！……一切的藝術都有他的異域，而且必然有的，因爲人比自然界小些就只能自足於描盡出那在他的範圍以內的自然的景色。但是在他的特別界限以

內每派的藝術都能達到牠自己的完備』。

這箇解釋是很充分的，在這裏我們還要補充斯坦拉得的批評，就是說意大利人『以畫牆壁爲始』的原因是因爲南方的乾燥的空氣對牆壁的繪畫是有幫助的。而北方潮溼的空氣是可以很快的毀壞那牆壁式的繪畫的。所以這種方法在北方的諸國中從不能普遍。氣候，和歷史的支配一樣，影響著過去乃至現在的繪畫家和建築家，眞的，南方鮮明的天色，和北方暗淡的天色一樣的，曾經大部分的決定繪畫的著色。這並不是說遺風對於藝術沒有影響。在富於過去的文明的偉大遺跡的國度中（如意大利），他們常常追憶的遺風必然有一箇無限的影響。由此，我們考察北方與南方的繪畫家的作品，就知道在精神與方法上有一箇差異。浪漫主義的南方的古代的精神，是明顯的與北方的實際的寫實主義相反。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注意於陷入將歷史的觀察藝術方法與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觀察各箇藝術家性格的方法相混亂的危險。一箇時代的藝術可以說是和那時代的總意識相配合的。而那時代的意識又總是和生產過程所達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藝術家自身的生活是不關緊要的。事實上是那樣不關緊要、例如，英國最偉大的風景畫家滕拉爾（Tusner）是生長在倫敦的，最有詩意的胸懷曠達的藝術家，喬治、摩爾藍德（George Morland）常常在那些煙氣薰蒸的飯店裏消磨時光，在那裏他每每是醉倒的，佛撒里（Vasari）是認爲在他的畫中比一切別人都更得有基督教精神的畫家，帕諾基邏（Perugino）卻是一箇非常的人。所以箇性毫不能爲憑的。在十五世紀的畫布上的多少慈祥的『聖女』沈默地注視著我們——帶著一副美麗的十五世紀的妓女式的面龐。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E. Grosse. The Beginnings of Art

第九章　藝術與社會發展

我們可以問，在那作爲『生產力』的生產工具與那藝術——如繪畫或樂器——的作品之間有什麼可能的關係呢？概略的說來，在藝術陳列館中的繪畫，就如麪包塊似的，是消費的物品。每星期中無數的觀衆『享受』著那由參觀國家陳列館中的繪畫所獲得的娛樂。實際上，那就是許多繪畫陳列在那裏的一箇最大原因。我們不能以味覺來吃或嘗牠們，但是我們能夠看見牠們，而且看了就感受快感。在觀衆中，那經常研究藝術的偉大作品的就是藝術家，研究各派繪畫的代表作品乃是藝術家的訓練的極重要的部分。這樣的一些繪畫結晶出來一種過去的理想，牠們是藝術的積蓄的經驗的表現。牠們幫助我們研究藝術的進化——關於形式，配合，著色，技術等等的思想的連續。因爲牠們幫助訓練現在的藝

術家以及與他以思想和告訴他以方法，所以牠們不只是消費的物品，也是生產的工具。牠們就是生產者，那藝術家的『工具』，猶如他的畫筆，顏料，顏料板，和畫布是他的工具一樣的。

專作空幻之想，而想把藝術或無論什麼事件與一箇時代的環境分離，那是毫無用處的。只有在其產生時代中研究繪畫才能形成一箇正確的批評。我們翻開整箇的藝術史一看，即是那些各種不同的派別，作風，技巧，主義，新陳代謝，繼經開來地在歷史軌道上向前遞演著。藝術的進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循著社會時代的轉變而轉變。推著藝術進化的動力，就是某一時代人類在經濟上的生活方式。決不是簡單由於某一天才的獨立創造。我們鑑定十四世紀的『文藝復興前的繪畫作品』，首先要問繪畫的進化當時達到了什麼階段。當時的藝術家有什麼表現的可能性呢？有什麼障礙物妨礙著他呢？他的時代的要求是什麼？他的時代的

一般的智識水平線是如何？在我們鑑定之前，也可以乃至必然提出別的問題，藝術在循環運動中進行著乃是完全正確的。每箇時期都有一箇藝術的復興，而其復興常常因爲一箇使新的派別存在著的變革。但是，在藝術的進化中是有一箇十分明確的思想的繼承的，而且儘管是停止和『革命』在現代的藝術與過去的藝術之間仍然是有一箇極明確的關係的。

有一箇時期是不知道『配景法』，發現了"Chairoscuro"，而且能夠繪出『神氣』。用油的繪畫埃及人是知道了的，而西方的藝術家卻不知道，直到Van Eyck昆仲再發現了這箇祕密的時候。當我說某一箇時期的藝術與當時的一般的思想（藝術只是當時的一部分）相適應的時候，我們是說藝術家如像政治家，兵士，及工人一樣的受物質的要素所限制。例如，在十二世紀中，人們不敢畫風景畫或裸體畫，因爲這種非宗教思想的罪惡行爲會被處以火刑。到了中世紀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種塵世的了，

是給幻想天堂的人們以不快的一派。這時期的藝術是實際的反射著這種精神狀態。再說遠些，在生產工具只是人們由木，石，骨，與角製成的時候，藝術家便在牠們的巖洞的牆壁上以彩色的土，繪畫野牛與馴鹿。那是當時可用的唯一『方法』，同時他們所描寫的乃是他們的生活的食料供給品，因爲獲得那類食物的供給，是他們的精神作用的主要所關的。所以，甚至有史以前的藝術也是適應於當時的社會意識的。現代的藝術是超脫國家觀念的，但是只是因爲現代的藝術在偉大的進化過程中表現著另一種明確的階段。如果我們要完全了解藝術與社會意識間的關係，我們應當把任何時代的藝術與當時的社會史來比較。就可以了解爲什麼現代的藝術家不繪畫聖女，聖徒，聖經故事；爲什麼十七十八世紀是人像的勃興時代；爲什麼，當加帕坦（Capetain）的鍍金龜鵠風行的時候，保恰爾（Bouchers），格里芝（Greuze），萊佈魯（Le Brun）和佛越剛拉

德(Fragonard)製作了他們的反射著暴亂時代的精神的精巧小作品，但是當洪水重壓著他們，而且主要的革命者把他們的『思想』弄得退到古典的羅馬，而以羅馬的名稱如 "Anarcharois" Clootz 和 "Grachus" Baboeuf 自稱的時候，那箇時期就反射在路易大衛德(Louis David)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是和著色的雕像似的拘泥而嚴肅的。

　這裏所談及於繪畫家的也是一樣可以適用於音樂家的。有些微細的變化是可以承認的，因爲這兩種藝術的形式是不同的，然而，音樂，如像藝術之每箇別的部門一樣，也是一箇社會的產物。音樂家不能像繪畫家，詩人，或雕刻家一樣把音調用爲那以著色和文字的方法來表現的外界物的象徵。我們能夠繪畫或描寫一罐果醬的形像，但是我們不能配合音調以代表一罐果醬。所以，一箇作曲家必然大部分依靠著他自己而竭力用他自己的能力，然而他不敢配合，也不會夢想配合，他的音調除他

自己以外使之任何人不能了解。他必然要觀察習俗與思想，而這兩者之存在恰如繪畫中之神氣與配景之存在一樣的；牠們都是社會技術的產物。人不能把感情或感覺與他的那些同類的人的——與社會——分離著，而且要由藝術表現他的感情與經驗，他必要在使別人認識或感應的方法中做去。無論什麼事體不如此做去，藝術家的動機都不是藝術而是近乎無意義的。

還有其他的種種理由。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哈坦場人，斐基島人，與秦格力斯人也有他們的音樂家，但是這些可尊重的人沒有製造鋼琴，風琴，乃至大喇叭。他們的鑼鼓，蘆笛，以及以皮爲絃的竹製樂器，在他們的社會發展的階段，充分的供給他們以那使他們能夠了解的音樂的唯一樣式。過去的（音樂的作曲中的）一切發現，如節拍，配合，樂譜（旋律配合法等等），都是一箇適應歷史過程本身的巨大的進化過程

。我們沒有希望發見貝多芬(Beethoven)或宛格勒爾(Wagner)生於Queen Bass時代。這些作曲家不能再生在福特汽車被發明了的時候。汽車只是能在生產過程中的一箇特殊階段出現，鋼琴或合奏的配合也是一樣的。但是人可以無工具而作曲。他們一定能夠的，但是柳里(Lully)與宛格勒爾間的差異不只是因爲在柳里時代的工具的缺乏的差異，而是因爲兩世紀以上的累積的社會經驗影響著和像這樣的充實著宛格勒爾的精神的差異。那麼，宛格勒爾是一箇比較柳里偉大些的天才麼？他可以是，但並非必然是，猶之拉斐耳(Rapheel)是比麥克達李倫(Magdalenian)的畫野牛的一箇大些的藝術家。音樂曲譜的價值之鑑定和任何別的藝術作品之鑑定一樣必然要在其時代的關係中。

古代人類的藝術的發生，正如語言學上所已經發見過的：人類的語言是從共同勞動時人與人之間互相通知的方法裏發展出來的，因爲當共

同勢動時。人人都必須發出箇別的聲音（如『吭唷』之類），以整齊大家之動作。所以人類言語中最早的『字』，大概都表明某種動作或運動——即動詞。其次發生各種物件的名稱——即名詞，以及物件的性質——形容詞。所以最初的音樂乃是人的聲音。自然界的聲音，如風聲和水聲。犬吠與鳥鳴。自然都是音樂的。但是嚴格的說來，人的聲音乃是人所用的最初的器具。人的最初的音樂不是歌劇類，也不是我們所知道的歌謠，愛的成分沒有滲入，敍事的成分也沒滲入。牠是發生於共同工作時，譬如一種聲音的迴轉重復，嗓子的一高一低而成韻，以使共同一齊的工作成諧和的，因而也就覺得這種工作輕鬆些。所謂棒歌(Dubinushka)是木匠瓦匠起重時口裏哼著的歌聲，他們大家唱著這種韻調相同的歌，自然各人手裏的工作也相同，於他們動作起來就感覺輕易些。又如軍隊的進行曲，也是同樣的作用。

所以初期的語言（發聲的）可以說是唱，但並不是「音樂的」。悲傷就哭泣，而發怒，憤激與快樂的聲音的表情就唱歌。當我們悲憂或喜樂的時候（可是這些感情也不大利害），我們自然而然的唱起悲哀的或歡樂的歌調。有的時候，覺得很高興，甚至於要蹈舞起來，彷彿小孩子似的。並且我們表示這些情感的時候，必定是很有組織的，很和諧的，這就是藝術中之所謂「美」，所謂「審美的」方式。

自然界的聲音的摹彷已經是「語言」的一部分。如是製造音樂的人造工具就發明了。最初的大概是水邊的蘆管——遠在絃器音樂的萌芽的那箇達到大鋼琴階段的發展之前。對於蘆管另外一種作爲「單音調」的蘆管又出現了，後來風笛與第二種「單音調」也產生了。而蘇格蘭的民間樂器便完全產生了——在古代埃及。別的樂器在時代的進程中都產生了，但是從古代獵人的樂弓進化到鋼琴差不多經過了一萬年以上的時間

。有鍵樂器在貝多芬時代這鋼琴起而代之了；鋼琴就增加了那箇音樂家的可能性。但是讓我們再從高潔處回頭到，不是那可笑的而是那音樂表現的頗低的界線上——讓我們再回頭到那風笛上。

無疑的，音樂界的最浪漫而有興趣的創造者之一，風笛，是發生於遠古。在聖經中牠被叫爲『喇叭』；爲羅馬人所使用——他們之中最有名的奏樂者就是李若（Nero）——在中世紀他們是十分普遍的。蘇格蘭的變化約在一千七百年才發展到第三種『單音調』。直到近代他們還沒有『音樂』。教授者把他的學生引到山邊而以特別不清晰的語言告訴他大聲歌唱，當某箇學生按奏風笛之指管的時候。現在的人們動輒說風笛無論怎樣只是不易了解的。那是因爲缺乏理解力。這箇樂器是古代文明的遺物。對於習慣於鋼琴音樂隊，交響曲與樂譜的人們似乎是野蠻的。風笛主要的是戰爭之音。世界上沒有那一箇樂器或者樂器的配合像風笛一樣

的引起戰爭的精神。牠發出戰爭的，那兇暴而不間斷鬬爭的聲音。牠們是在古代鬬爭時期，當戰是生活的必要的時候，製造出來的。把風笛作爲戰爭的武器看，你就會領略到牠的意味了。例如，把現代所能奏的最好的——那十分高尙的音樂隊——與風笛來比較，你就了解我的論點了。風笛繼續生存，因爲產生牠的時代繼續生存，直到比較近代的時期。蘇格蘭的氏族制度僅到一七四六年才消滅。現在奏風笛的多半是由於雅性。甚至於到現在他的最多的使用者還是蘇格蘭的乃至準蘇格蘭的士兵。牠從沒有消滅，因爲人類之保存牠也是他們保存古代獸中之楔骨獸與鴨嘴獸一樣。在這種原始的樂器還差不多不變的存在著，進化的人民經過若干世紀的社會發展從牠那裏產生了牠的近代文明的兄弟，那大風琴——一箇用由一箇人造的風箱所生的氣體壓力以發聲的音管與調音器的巨大組合。就是這樣，社會產生了牠的音樂和表現音樂的方法。

參考書：

Clarke; Essays on History.

Grosse: The Beginnings of Art.

第十章　結論

在本書上述之各章中，我們已將各家對於什麼是推進歷史的眞實動力的意見加以簡略的敍述，旁及於宗教，戰爭，藝術諸問題的歷史動力。所有的引用話十九是從一些獨立作家的作品中，引用出來的。雖則是管窺蠡測，挂一漏萬，但讀者至少可於這簡略的記述中，得到一箇對於歷史演進的基本概念。現在我們要結束上述各章意義的要點，並對於那些用不正確的觀點解釋歷史過程的理論，加以述評。

歷史就是人類在無盡宇宙中所創造的他自己的生活記錄。這兒我們就得先注意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是『生活記錄』。所以，活著的人類箇人的存在，是一切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歷史是從人類生活的那一頁開始的呢？人類原始的歷史行爲，不是由於人類的思維，而是由

於人類能除了利用自己天賦的五官四肢等工具而外，還能製造工具。製造工具，是人類從其他動物進化成爲人類就是最高等動物的分野，也就是人類創造自己歷史的開端。所以富蘭克林曾經下過有名的界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因爲人類能製造工具去補充手足勞働的不足，從拿取石塊樹枝去抗抵外界的壓迫，經過幾千年的進化，一直到現代只用一舉手投足之勞就能指揮幾萬馬力的機器，就使人類不但成爲對一切動物的優勝者，而且成爲對自然界的優勝者。因爲有了自造的工具，人類就會不但採取自然界現成的產物（如植物的果實，動物的肉類。）來消費，而且能夠用經濟的行爲——生產去獲得更豐富，優越的生活資料。就是將自然界內原有的材料，拿來改變形式，使牠更合乎人的生活需要，或者用人爲的方法去增多這些材料。

此外，我們對於人類的認識，還得更進一層，就是人類不但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同時又是『會經營社會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有史以前，就開始人類相互扶助，分工合作的生活。爲了征服自然，爲了生活的豐滿，人類不但要利用工具的力量，同時也要用人的羣力。所以如魯濱孫式的脫離社會孤立的英雄，或中國之所謂『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都只能存在於文學家的幻想之中，不能存在於人類世界。

能夠製造工具，並且靠了這工具的作用和進步來生產，就是由種種的技術去獲得更豐富的生活資料，因此更使人類能有生產力的儲蓄。先有了物質的生產力，就是工具和生產方法，然後便有了精神的生產力：經驗，才幹，技能。這些精神的和物質的生產技術的逐漸不停的演進，就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主要基礎。所謂文化，就是人類和自然界鬭爭並且

改良人生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成果。所謂歷史，不過是人類生活經驗，過程的一種記錄而已。

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知道：人類在獲得生活資料的經濟行爲中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是人類歷史的主動力量，就是主要動力。其作用之偉大，有如馬達在機器內或法條在鐘錶內的作用。這是我們拋棄唯心論或觀念論。從客觀的事實去研究歷史應該認清的前提。

過去無論中外的史學家，多不知從人類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著眼去研究歷史，往往把歷史當著是偶然的，少數『英雄』，『偉人』所創造的結果，在中國如所謂：『英雄造時世』的見解，在歐洲如十九世紀的大史學家塞容波(Charles Seignobos)在他著的當代歐洲政治史上竟這樣的去解釋十九世紀的歐洲歷史進程：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一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

（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立之怯懦而造成的。一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箇人利用拿破崙第三（Napolé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一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箇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是，歷史究竟是少數英雄之『偶然』的建築物或單純的歷代帝王的家譜麼？當然不是的！就最顯著的事實說，英武雄才如拿破崙，終難逃滑鐵盧的慘敗；一世梟雄的袁世凱，卻只能做得四十九日的洪憲春夢。所以箇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主觀的任意的干涉或顚倒，結果只能引起糾紛和戰亂，成爲歷史的罪人。反之，如果箇人能完全應適於歷史發展之一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這傾向的動力相衝突，就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

意義和成功。英雄偉人的『偉大』，並不在他箇人能渲染歷史事蹟以特殊的色采，而在牠具有某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一般的或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巨大而複雜的社會需要。所以在本書的第一章內，我們根據查理士坡頗爾特對英雄偉大問題所定之科學底五條原則，否認一切歷史是少數英雄偉人所偶然創造出來的謬見，肯定個人必須與歷史和時代環境相適應，才有作用。

人類在經營歷史生活之中，不但要適應人類自身經濟生活的條件，同時還要適應自然界的地理環境。地理是一切史學家所公認對於人類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客觀動力之一。在熱帶地方，因爲太陽光線的强烈，人的皮膚便變成黑暗色。甚至於純黑的。因此，人類之中便分出『人種』(races) 來，所以可以依膚色而分別人的種類，爲白種，黑種，黃種……等。再則，氣候 (Climat) 亦可以影響人類文化的方式發展及程度。酷熱

氣候之中，自然界產物非常豐富，那地方的人用不著勤苦的勞動，也就沒有促進他們的生產力之發展的原因。嚴寒的氣候之中，例如北冰洋一帶，自然界的產物又異常之貧乏，單是保存生命這一件事，便差不多將人的能力全部佔領；所以，那地方的人便沒有功夫，沒有可能去增多自己的生產力，去改良自己的生活，使他豐富而繁複。因此，我們在酷熱及嚴寒的地帶，不能找著豐富的文化。人類文明的能力，人類豐富的生產力，正發展於溫和的氣候之中；這種地方的自然界，既不過於豐富，使人類不用勤苦的勞働和發明，就能坐享其成；又不過於貧嗇，使人類的努力往往勞而無功——卻正可以得著很大的結果。

地面的構造，山地或平原，河流的豐嗇，海岸的遠近——凡此一切，對於人類歷史文化的發展亦都很有影響。那廣闊的平原，那許多長河大川——是最初的自然界的交通的要道，所以太古時代許多大帝國都在

這種地方建立起來。那山間的高原裏便是些小共利國。那沿海的地方，尤其是海岸線很彎曲的地方，水道交通很方便，所以這些地方發生航海術及國外貿易也最早。自然，這些地方生活比較繁複而豐富，居民的眼界比較開闊，物質的精神的文明的發展得都比較快。例如古代的希臘，及近代的荷蘭，英國，人類生活比較的單調，經過幾千百年而生活方式不變，這種地方的生產力及全部文化，全部歷史，發展得都比較慢，甚至於有一種停滯的狀態。

在前文的第二章裏，我們曾就過去的事實，把地理關係對於阿拉伯，埃及，英吉利等國歷史所發生的重大影響，加以詳述，證明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速度利方向一開始就受自然界的條件，地理環境的支配。等到這一發展在地理條件限制之下開始有一定的方向之後，則人類歷史的進程就於自然的影響之外，還有自己的人事上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

一箇，就是我們在上文說過的人類在經營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力的狀態。人類愈往前發展，他的生產力也愈發達，則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權力也愈高，人類受自然界及地理環境的支配也愈少。在從前神權或宗教時代，人是自然界或人對自然界假想的『神』的奴隸。在現代科學時代，一切自然界卻成了人類爲生活去取材，去征服的對象了。本此說明，我們研究歷史，就應該注意地理，雖然在歷史進程中有左右的作用，但我們估量地理對歷史動力的比重，必須放在歷史主動力——人類經濟生活技術就是生產力之次列。那些過於著重地理動力而把人類推論成爲須完全受自然界的支配的謬見，是需要用科學的分析，加以排斥的。

在歷代史學家中，尙有一些拿心理或生理的原因去解釋歷史運動的，我們叫他是心理史觀或心理的歷史的動力論者。這一派史學家如我們在第三章所說，以『人』爲出發點，把人類的需要，慾望，思想，信仰

，意志等的任一方面當作是推動歷史進行的動力。像我們在上文已經論到的非爾古孫，約弗諾，拉薩魯斯各在史學界有聲譽的學者，都是從歷史的人物中的箇人和箇人的某項特點去解釋歷史。雖然他們所用的術語不一，或者說是由於人的悟性，或者說是由於神智，或者說是由於人格，心理，觀念——無論他立論的方式怎樣，總之是拿「人性」做出發點來說明歷史的變動。

心理的歷史動力論者在史學上固然有相當的貢獻，但同時也有不可掩飾的缺點。心理動力論者的缺陷恰恰是與地理動力論者的缺陷相反。顯而易見的就是地理動力觀過於忽視人類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心理動力觀卻太誇大了箇人在歷史運動中的影響。我們縱然承認箇人——即所謂英雄的在歷史上作用的重要，但卻不應把一切箇人在歷史中的影響和整箇社會人類行動的歷史作用混爲一談，要使心理動力論更與歷史的實

際相符應，就必須先不把人當著是孤立於時間空間之外的動物，將整箇時代，社會，尤其是人們所經營的經濟生活的技術進步的狀況和英雄的箇人之思想實行連繫起來作綜合的評斷。這樣，心理動力論才能免去偏見，不致把歷史影響中的一部人當作全體，把進步動力中的一小部，當作全部，或武斷時代的『英雄』能以萬能的影響，統治整箇的歷史。

在人類全歷史的活動中，道德和宗教也是具有影響而爲一般學者所常加討論的對象。在本書內，我們也費了兩章的篇幅加以闡明。所謂道德，本是最抽象而沒一定標準的；同時也是隨著時代環境的進化而進化的。道德就是人類的一種社會本能，表現成爲愛種，愛羣，愛國種種的意志行爲，是不一定經文明規定而爲多數人所願遵守的信條。我們的社會不斷在時間的軌道上向前馳進，我們的道德觀亦不斷隨時間的推移而新陳代謝。例如在氏族社會內，人類視爲自己氏族同其他人羣殘殺是無

上的道德，縱然犧牲性命亦所不惜。到了後來貴族統治奴隸的城市社會，卻把『忠心爲主』，就是爲自己的領主諸侯去拼命視爲至高的道德，那些貪得無厭，暴強豪縱的諸侯地主之間，便發生新的『國士之報』的遊俠式和武士道式的道德，所謂『匹夫拔劍』的義勇。如像中國戰國時代爲貴氏趙氏捨子殺身的程嬰和公孫杵臼，爲智伯而三擊趙襄子的豫讓，竟成爲千古美談。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卻改變從前爲某一氏族，諸侯而犧牲的道德標準；『平等』，『博愛』，愛國，軍國主義，爲『文明人』的歐洲來用大礮屠殺『支那』人，卻一概成爲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道德』了！某一時代的道德觀念，固然在歷史上發生有影響的副作用，但我們必須先從人類的實際生活著眼，認識道德是受某一時代，種族或貧富懸差的人羣之經濟條件支配的。在同一時代中，兩箇互相戰爭的種族，國家或貧富不同的人羣的道德觀念，是絕對相反的。

復次，檢討歷史的過程中，宗教問題亦是我們所當論及的。宗教在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樣呢？宗教的發生是由箇人受自然界的威脅和對自然界的不了解。原始人類，對於人類生殖作用的『神妙莫測』，就崇拜生殖器演進而成爲十字架，感到大山，洪水，風雨，土木對於人類的作禍和造福的『天意難測』，就發生火神，水神，天神的崇拜以至於中國的『五行』相生相克的神話。這樣看來，所謂宗教，就是愚昧人生的反映，人對於這反映加上些自己想像出來的色彩，就有了『上帝』，『天堂』，『地獄』一種種的假設。後來人類的社會發展，人與人互相間的關係日加複雜，社會上分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宗教便成了統治者利用以維持特權，削減反抗的工具。所謂『聖人假神道以設教』，就是感到人爲的君主貴族壓迫人民的不足，還要造作『神意』的壓迫教條，以束縛平民，不使有反抗的意志和行爲。我們考察宗教發展的領域和歷史

，就可以得到兩種概念。一是人類受自然界的支配愈利害，宗教的影響就愈深刻；二是科學愈發達，宗教對於人類的影響就愈削弱。農民其所以比城市工人格外要迷信些，就是因爲農民的生活，命運時常受水旱雨雹的支配，就不期然而然的以爲有『天神』在冥冥中左右人生了。在科學史上，一六〇〇年意大利的學者白魯諾因宣傳唯物論的『異端』而被燒死，達爾文因發明進化論，推翻了『上帝造人』的教條而幾乎被教會處死，都正是因爲科學的發達，就是『宗教家』一切鬼話的致命打擊之故。所以，宗教在人類生活經驗幼稚的時候，固是必然發生的歷史現象而且在歷史過程中也有過一箇盛極一時的階段，但在人類思想尤其是科學發達以後，人類由受支配於自然的時代進到支配自然的時代，就能以科學爲武器，打破一切宗教的迷妄。神權的領域的削弱以至消滅（自然不是現在就已如此）。就與科學領域的擴大以至支配全自然，成反比例

的發展了。

再次之，我們研究歷史哲學應該論到的就是思想問題。思想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常被一般主觀的觀念論者所混淆，弄得模糊不清的。通常的玄學論者都把主觀的存在，當作是支配萬有的唯一原動力，思想就是人的主觀的作用，於是思想就被認作是一切歷史運動的後臺老板。這種觀點也是非常不正確的！我們生存在科學世界，決不能像玄學論者或神學家武斷思想的發生是由於人的『精神元素』，或『隱特來西』（像德國的杜里舒），抑或是由於『上帝』所賦與人的靈魂。像這樣武斷的說法，不但是非科學的而且是對於學術眞理的研討有害的。生物學和生理學很正確的告訴我們，人類之所以能夠思想，就是因爲上帝給了人一箇構造比較完備的『腦筋』，再加人會利用這腦筋，越用越精密，就使人類有了超越一切的進化。是我們的腦筋從主觀方面出發，

去創造一切思想呢？還是因爲有了一切客觀的物質的事變的存在著，而且演變著去刺激我們的腦筋，反映而成爲思想呢？一切思想是導源於主觀從客觀得來的印象，換言之，思想就是一切外界的物質演變所反映出來的，猶之如電影的銀幕之於演映機一樣。我們從表面看去，電影似乎是在銀幕之上動作著，而實際上卻是影片在發動機上的動作，銀幕上的一切，不過是這些動作的反映罷了。所以我們在討論人類思想的時候，就得首先打破一切玄學論者觀念論者的『人類中心』說，把人看做自然界中整箇宇宙的部份，要把人看著是主觀而兼客觀。在哲學界知名的費爾巴赫的功績就是把人當作是心理的客觀，同時又是生理的客觀。他說：『我感覺和思想的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眞正的物質質體的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之基礎。客觀世界不僅

在我以外，而且也是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

思想就是一切客觀存在反映到人類腦筋上的過程，思想的發展，亦是根據於人類物質生活的需要。人不是『爲思想而思想』，而是爲滿足某種物質生活的需要而思想的。幾何學和水力學的發生，是由於古代灌溉和測量土地的需要，天文學的發生，是由於人民受尼羅河的汎濫及農民在工作中對天時預測的需要。推之其他一切哲學，藝術，政治思想，都是如此。一種對於人類實際生活沒有需要的思想，就只有被扔在垃圾桶內。

最後，我們在本書裏曾分配了兩章的篇幅去研究的，就是藝術問題。因爲藝術是時代生活的反映，在我們研究歷史的全部運動中，藝術的起源及發展，亦要加以檢討。人類在經營他的生活中，首先是在獲得物質的資料（衣食住行）以維持生活，在原始人類生活過程中，洪水猛獸

水旱天災不斷對人類施以迫害，自然界對人類生活材料的供給，也不豐富，使人類終日克苦經營，難得溫飽，所以，人類也難得空餘的精力時間去創造偉大的藝術。但是人的本身，卻是具有意識行態的動物，人們除了經營物質生活去滿足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外，同時就要經營精神生活，來調濟人的感情。人在羣力勞働疲乏的時候，就不自覺的由吭唷的呼聲，由簡而繁，成爲通俗的歌謠。例如中國最古的詩歌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以及俄國的古詩：『我們就是這麼下了種，下了種』！都是反映一種農民勞作的自然風趣。這是人類詩歌的起源，繪畫的最初型式，亦是由於漁獵時代對於飛禽走獸的摹擬，最初的舞蹈，也是扮演著打獵的情形。這都是在現代古物發掘甲骨研究之中，那些從遠古保存在土裏的獸骨或器皿上面上表現的，乃是研究歷史最當重視的材料。所以人類經營精神生活的藝

術，是和他經營物質生活的經濟狀態，是不可分離的。各箇不同時代的藝術，都是反映各該時代的經濟風俗和生產方式。

人類文化再往前發展，到了更高一點的階段，藝術便要依人類生活關係的改變而變更其性質。一方面社會上有了一部分優越生活的統治者，他們有了充分的時間和地位去享受藝術，藝術成爲非平民的，羣衆的了，另一方面，藝術的作用變成一種職務或官職，君主和貴族能夠利用他們的金錢和地位去籠絡藝術家爲他們作詩獻賦，譜歌度曲，由此則非有優越地位的平民，就難以一窺藝術之門了。從此藝術就和其他的社會思想一樣，變成統治者特權者的工具。最初，藝術便是宗教的附屬物，文飾宗教的神像，幫助那些儒牧去影響信徒的感情。隨後，社會的貧富關係懸隔愈甚，藝術更成了上層社會的裝飾品，和私享物。而且最初那些高等的，組織得很整齊的藝術，自然只能發生於高等社會中，因爲高

等社會人們在時間上，物質生活上知識眼界上以及精神上都處在比較優越的地位而便利於藝術的提倡和創造。

古希臘第一詩人荷馬(Homer)的敘事詩曲俄德西(Odyssey)及伊略德(Iliad)以及俄國古代詩曲『伊果列夫軍營之頌』(Slovo Opolru Igoreva)，便都是宮庭之中的詩曲，其中當然只描寫王公大人及其侍衞等類的功勳奇蹟，中世紀封建時代之中，大都只有武士道的詩，而在最高的宮庭親貴之間，猶其是十七八世紀帝制政體下之法國，便又發生許多頌聖的諂媚的所謂館閣體的詩詞歌賦頌贊英雄的曲本和戲劇。至於資產階級躍登歷史舞臺之後，藝術的形式和內容，便劇烈的變更起來，尤其是文學·發生所謂傳奇小說(Roman Novel)，描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哀樂際遇。再就中國古代文學來考察，那些堆砌的古典的作品，在商周的雅頌，楚的離騷，漢魏的樂府，雅舞，郊祀，三都賦上林賦等。都是充滿了

宮庭的，宗祀的，懷君的，歌頌君權的色彩。凡此所引，都是藝術成爲君主貴族的粉飾物，藝術家做了君主貴族的臣僕，失去藝術之平民意義的證明。不但藝術的內容，並且藝術的形式，也是某一時代社會關係的反映，某一社會層的地位，觀點及概念之反映。那些生活有保障的農村貴族，他們的生活是很穩固的，很恬靜的，所以他們這派人的文學，便是長節的傳奇小說（Roman），詳詳細細描繪天然的風景等等。並且後來新式的文學家，他們住在城市裏面，城市生活本是繁雜而迅速的，差不多像電影影片似的，許許多多的現象和新聞很快的傳遞轉變，城市中人的神經自然較爲興奮，生活也比較得沒有保障，所以他們這派人的文學，便不能像托爾斯泰（Leo Tolstoy）似的，靜靜的坐著，論年論月的著作長篇的巨著，因此，他們的文學大致都是短篇的雜談小說。

我們所論的文學，是藝術之中最普及最通俗的一種，至於其他的藝

術，如圖畫彫刻建築，甚至於音樂，大致也都是如此。

固然，藝術之中有一種題材爲「戀愛」，——這是各民族各時代所同具的。在人的感情佔著很大的位置，彷彿是全人類的，不受經濟地位的影響，甚至於不受社會關係支配的。戀愛的題材，差不多在各種各式的藝術裏都有，而且是歌詠描寫不盡的。當然，既然所謂美感在禽獸之中就已發現，這本是互爭女性的結果，那麼，人生之中的性感（男女情愛之感）自然在藝術裏有很大的作用。然而就是戀愛的情感，也是因經濟地位身分的各殊而不相同的。如果將武士道時代的情歌和俄國民間的情歌比較起來，或者普希金（Pushkin）所歌詠的貴族戀愛與郭勒獨夫(Roitsoff) 所歌詠的鄉民戀愛兩相比較起來，立刻便可以看出其中的區別。

在藝術史上，一切不同的派別，色采，以及發展的過程，都可以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明他其所以成爲這種風格，形式，內容的物質原因，

而且只有如此解釋，才能正確的去研究藝術，在本書的八九兩章內，我們曾詳細的說到希臘，羅馬，意大利的古代藝術，並引用斯坦拉德對柏林呑別墅的藝術作品的評語來說明一切藝術之所由產生，演進的條件。肯定一箇時代的藝術是和那箇時代的總意識相配合，而那箇時代的總意識又和生產過程所達到的階段相適應。在我們探究藝術史的時候，決不能把藝術和他的時代環境分離，只從作家的箇人著眼去追求各箇時代藝術的作風，技巧，派別的原因，必須把握著時代的，人類物質生活的各特徵，然後才能在正確的軌道上探討藝術。在第九章內，我們曾列舉了不少的歷史事實，來說明藝術循著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一般過程。

總結以上比較詳細的解釋，我們就可以對於人類歷史的動力，英雄的作用，道德，宗教，思想，藝術在歷史運動中的作用和進化的規律，得到一些初步的認識和觀念。歷史運動的內容雖複雜，若要從宗教，思

想，藝術之任何一方面加以詳細的闡明，那就是連篇累牘也難盡所應言。但我們在研究一切歷史過程的時候，必須把那供給人類生活物質的條件和解決生活問題的經濟手段和狀態爲研究歷史過程的鎖鑰。因爲只有這，才是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

本書爲編者的學力和所搜集的材料所限，深慚不能對於歷史運動有更詳盡透澈的說明，至多不過盡箇人的綿力，對歷史哲學的初步，加以最簡略的說明而已。錯誤遺漏之處，自所難免，這是要就正於讀者並祈指正的。

——完——